

# 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 華僑社會的變遷

許瓊丰\*

## 摘 要

戰後日本華僑人口 4 萬多人，其中臺籍華僑約佔半數。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背景，因此二次大戰結束後，在日臺灣人加入華僑社會，其人數凌駕中國各省籍華僑，一躍成為第一位。人口結構的改變，不僅促使華僑社會發生顯著變化，也成為日本華僑社會的特色。但脫離了日本 51 年統治後的臺籍華僑，在接受「中國人」新身分同時，卻也無可避免受到中國政局的影響。特別在經歷了臺灣二二八事件，及因國共內戰而在 1949 年分裂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中國」的對峙局面下。並且，戰後冷戰體制下圍繞在臺灣、中國、日本三方間錯綜複雜的東亞局勢，也影響了臺籍華僑與日本華僑社會。就這樣，臺籍華僑歷經不同政權與身分的轉換後，有部分人自發地選擇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致力於各種促進「中」日關係的活動與宣傳社會主義中國，日本華僑社會也因此逐漸走向對立與分裂。

神戶為戰後到 1950 年代末日本華僑社會人口數佔第二位的都市，在戰前即已形成的傳統僑社，與東京分屬關東和關西地區的兩處華僑集中重鎮。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在神戶的臺灣人雖只有少數，但到了戰後不僅人數大幅增加，且在華僑社會佔有重要地位，也有明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傾向。故本文以在神戶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僑組織為中心，一方面具體分析在神戶的臺籍華僑與其華僑組織變化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能從與東京華僑社會間的連動關係，瞭解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展開對日本華僑的政策。

**關鍵詞：**日本神戶華僑社會、在日臺灣人、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華僑聯誼會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來稿日期：2010 年 12 月 31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4 月 15 日。

- 一、前言
  - 二、冷戰體制下的日本華僑社會
  - 三、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的組織與活動
  - 四、左傾的神戶華僑團體與其活動
  - 五、結論
- 

## 一、前言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在日臺灣人與日本華僑社會原分屬不同的群體。但隨著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在日臺灣人回復中國國籍加入華僑社會，促使華僑社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戰後初期臺籍華僑約佔華僑社會總人口的半數。人口結構的改變，固然是造成華僑社會結構變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臺籍華僑脫離日本 51 年的殖民統治後，在接受「中國人」新身分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受到「祖國」政局的影響，特別在經歷臺灣二二八事件，以及因國共內戰在 1949 年分裂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中國」的對峙局面之後，臺灣人在形式上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政治認同。國際局勢方面，戰後日本接受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SCAP, General Head Quarters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佔領，進行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改革，後隨著美蘇對立冷戰局勢的逐漸形成，美國改變對日佔領政策，將日本納入東亞反共的戰略基地。<sup>1</sup> 在內部與外部變化的多重因素下，臺籍華僑與戰後華僑社會的相互關係與影響成為必須探討的課題。

---

<sup>1</sup> 黃自進，〈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2004年9月），頁143-194。

而很明顯地在進入這個課題之前，必須將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置於東亞國際局勢中，有必要瞭解日本對「中」<sup>2</sup>政策的形成背景。由於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兵參戰，改變了美國的遠東戰略布局，開始積極策劃簽訂〈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使日本成為對抗共產勢力的前哨站，並推動締結〈中日和約〉（日本：〈日華平和條約〉）來確立日華外交關係，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維持中國政權的合法性。<sup>3</sup>就日本的立場而言，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仍為「唯一」代表中國政權的政府，但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大陸的事實，使得在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外，也必須制定符合國家利益的中國政策。於是在簽訂〈舊金山和約〉前，吉田茂首相於1951年10月29日在參議院接受質詢時，即曾經表示有在上海設置在外辦事處的想法。<sup>4</sup>但另一方面，日本急欲重返國際舞臺，因此吉田茂首相必須考慮到美國的立場，以及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維護天皇制度、反對日本領土分割、遣返日軍、日僑等主張與措施。<sup>5</sup>亦即，日本在政治與道義方面都須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唯一考量，因此最後吉田茂首相以〈吉田書簡〉表明了遵循美國的遠東政策，以及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的決心。但不可否認，日本對北京政府「政經分離」原則的雛型，可說是由吉田茂首相建立起來。<sup>6</sup>

日本欲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經貿交流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為日後中日關係預留發展餘地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無法切斷歷史發展過程中早與中國大陸存在的經貿關係。戰前的中日經貿關係，根據張啟雄研究，1930年代中國大陸已是日本的第三大進口國，同時也是日本海外最大的出口市場；更甚者在1940-1945年

<sup>2</sup> 本文日本的對「中」政策，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但若為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則簡稱「日華關係」；反之若為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簡稱「日中關係」。參考徐滋馨，〈日本吉田內閣期中國政策的原點：以「等距離外交」為探討對象〉，《國史館學術集刊》18（2008年12月），頁167。

<sup>3</sup> 張啟雄、葉長城，〈「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亞太研究論壇》35（2007年3月），頁123-193。

<sup>4</sup> 張啟雄、葉長城，〈「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頁123-124。

<sup>5</sup>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東京：番町書房，1963），頁146；衛藤瀧吉等編，《中華民國を繞る國際關係：1949-65》（東京：アジア政經学会，1967），頁129。

<sup>6</sup> 張啟雄、葉長城，〈「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頁124。

間，日本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貿易依存度，曾有平均高達七成以上記錄。<sup>7</sup> 因此，從親美保守派的吉田茂內閣、到親中的鳩山一郎和石橋湛山內閣、親美反共的岸信介內閣，無論歷屆內閣的中國政策採取何種立場，都無法斷絕與北京政府的關係。

反之，儘管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建起正式外交關係，但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經分離」模式，卻使中華民國政府感到不安。失去大陸統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後為光復故土，以「反共抗俄」為國策；在對日政策上，採「以德報怨」方針，從希望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到經貿文化交流，一切皆在反共基礎上進行「反共外交」。反映了日華關係上始終存有來自中國方面的威脅。

在以上的背景下，說明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與臺灣、中國、日本三方發展有緊密關係。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從中國觀點出發討論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sup>8</sup> 或是從戰後中日兩國交流過程中論及華僑的部分。<sup>9</sup> 而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則有以去殖民地化及以「在日臺灣人」主體性觀點出發的探討，<sup>10</sup> 更多的研究是分從兩岸政府對留學生政策的研究分析。<sup>11</sup> 總之，直接涉及戰後華僑的研究並不多，而是以圍繞在日中、日華政府間的關係討論而兼論華僑問題，探討的

<sup>7</sup> 張啟雄、葉長城，〈「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頁 142。

<sup>8</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埼玉：日本僑報社，2004）。

<sup>9</sup> 王紅艷，〈中国人遺骨送還運動と戦後中日関係〉，《一橋論叢》119: 2（1998年2月），頁 87-103；波多野勝、飯森明子，〈李德全訪日をめぐる日中関係〉，《常磐国際紀要》4（2000年3月）頁 1-18；飯森明子，〈中国紅十字会代表団の再来日と日中関係〉，《常磐国際紀要》7（2003年3月），頁 197-212；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49: 3（2003年7月），頁 54-70；吳日煥，〈1950年代日中・日台關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筑波法政》40（2006年3月），頁 153-176。

<sup>10</sup> 何義麟，〈光復初期臺灣知識份子的日本觀（1945-1949）〉，收於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67-207；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之處境與認同：以蔡朝忻先生的經歷為中心〉，《臺灣風物》60: 4（2010年12月），頁 161-194。

<sup>11</sup> 林清芬，〈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10（2006年12月），頁 97-128；白土悟，〈現代中国初期における留學生帰国政策の考察〉，《九州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16（2007年），頁 39-62；王雪萍，〈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收於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 203-232；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收於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 31-51；王雪萍，〈中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學生・華僑帰国促進政策：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間交渉過程分析を通じて〉，《中国 21》33（2010年7月），頁 155-178。

主題雖呈多元分歧，但也代表了戰後華僑問題的複雜性。而且，過去的研究成果受限於資料，並未能掌握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發展的複雜全貌。

近年來隨著臺灣外交部檔案的開放，已引起海內外學者對日本華僑社會或在日臺灣人的關注，筆者也進行了初步研究；<sup>12</sup> 此外討論如何利用臺灣與日本收藏資料，或進行交叉比較的研究新方向也已被提出，<sup>13</sup> 但有關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組織整體變化的歷史過程至今尚未有所探討。筆者認為，戰後華僑社會最大的改變，來自於在日臺灣人的加入，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中共）的成立與其對華僑政策的展開，因此本文以傳統的神戶華僑社會為焦點，嘗試釐清其歷史變遷的過程。

另外，在臺灣外交部檔案尚未開放前，以阪神地區為主，具體從華僑社會制度面與認同歸屬問題進行分析的代表性研究，可舉許淑真<sup>14</sup> 與陳來幸<sup>15</sup> 的研究為代表。其中值得關注的是，陳來幸從法律制度面分析戰前、戰後對華僑社會結構

<sup>12</sup> 利用外交部檔案做分析研究的可舉，許瓊丰，〈在日華僑の經濟秩序の再編：1945年から1950年代までの神戸を中心に〉，《星陵台論集》41:3（2009年1月），頁117-150；許瓊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華僑政策と神戸中華同文学校の再建〉，《華僑華人研究》6（2009年11月），頁63-80。

<sup>13</sup>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之組織與活動〉（98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陳來幸，〈神戸の戦後華僑史再構築に向けて：GHQ資料・プランゲ文庫・陳徳勝コレクション・中央研究院檔案館文書の利用〉，《開港都市研究》5（2010年3月），頁65-73；何義麟，〈戰後在日台湾人における華僑意識の変容〉，發表於日本華僑華人學會主辦、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の地域研究センター・交錯する「北東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諸相」研究会協辦，「日本の華僑華人社会にみる「台湾」：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一側面」（日本華僑華人学会2010年度第1回研究会の報告），2010年7月16日。另外，利用日本方面資料，進行戰後日本華僑社會重建研究的最新成果，有陳來幸，〈戰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建と構造変化：台湾人の台頭と錯綜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的帰属意識〉，收於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東京：千倉書房，2010），頁189-210。

<sup>14</sup> 許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1945-1952）：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東京：巖南堂書店，1983），頁119-187；許淑真，〈新華僑の生成と日本華僑社会の変容〉，《攝大學術・B、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篇》5（1987年2月），頁25-42；許淑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からの引揚げについて：台湾出身者を中心に〉，《撰大人文科学》3（1996年2月），頁19-41；許淑真，〈第二次大戰後在日台湾出身者の国籍取得について〉，《近百年日中關係の史的展開と阪神華僑》（研究課題番号：07301074，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平成7-8年度，1997），頁35-45等。

<sup>15</sup> 陳來幸，〈二戰後的日本華僑社會與華僑教育：「新華僑」臺灣人發揮的作用〉，收於夏誠華主編，《僑民教育研究論文集》（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2005），頁137-157；陳來幸，〈神戸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形成と変容の契機——戦前戦後：制度・帰属意識の視点から〉，《不平等条約体制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外国人の法的地位に関する事例研究》（課題番号：15202014，平成15-17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A）（1）研究成果報告書，平成19年3月，2007），頁65-80等。

的制約與影響外，並利用戰後發行的華僑刊物，討論在日臺灣人的加入與神戶華僑社會變化的關係，進一步從僑居地的社會背景與祖國政治局勢的變化，分析神戶華僑的認同歸屬意識的變遷過程。<sup>16</sup> 由於神戶華僑社會在戰後初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反映神戶華僑社會特徵同時，也能部分反應整體日本華僑社會實態。不過，陳來幸的分析，雖然實際體現了華僑的現實處境與對應。但在反映了戰後神戶華僑社會的變化之際，神戶華僑社會組織重組之具體情況如何？以及神戶華僑社會與日本華僑社會間又有如何的連動關係呢？仍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

本文之目的在檢討二次大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而以神戶為中心所欲探討的是：一、戰後國共對立背景下對日本華僑社會重組的影響，特別以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華僑團體為焦點。二、戰後在日臺灣人與華僑社會的關係。除了由冷戰體制下的東亞局勢看華僑社會的演變外，透過臺灣外交部檔案與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等收藏資料的分析，具體考察神戶華僑團體的變化與發展過程和特色。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日外交攻勢在 1958 年的長崎國旗事件中受挫，因此，本文在時間斷限上，以戰後到 1950 年代末做為討論重點。

## 二、冷戰體制下的日本華僑社會

### （一）東京華僑總會與中國留日同學總會的發展與分裂

戰後，東京是日本的政治、經濟中心。1946 年 4 月，在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指導下，結合戰前中國各省籍華僑與在日臺灣人在東京設立全國性的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以下簡稱「留日華僑總會」），並於 43 個地方設有華僑聯合會。<sup>17</sup> 總會與聯合會的功能，以神戶華僑總會<sup>18</sup> 為例，在 1952 年 4 月〈中日和約〉生效前，神戶華僑總會負責協助駐日代表團處理登記戶籍、國籍、和佔領軍當局交

<sup>16</sup> 陳來幸，〈神戶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形成と変容の契機——戦前戦後：制度・帰属意識の視点から〉，頁 65-80。

<sup>17</sup> 盧冠羣，〈日本華僑經濟〉（臺北：海外出版社，1956），頁 31。

<sup>18</sup> 神戶華僑總會為戰後日本設立最早的華僑自治團體，1946 年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總部設於東京以後，公文書信等仍繼續使用神戶華僑總會稱呼。參見許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1945-1952）：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頁 141、147。

涉物資供應、保釋戰爭時期作為政治犯或違反統制經濟而被逮捕的華僑、送返、救濟貧困華僑、調解華僑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糾紛、處理有關和佔領軍以及日本官方的交涉、納稅等事項。<sup>19</sup> 其作為駐日代表團與華僑間的聯絡橋樑，具有半官方性質，即使在 1952 年後，仍為華僑與駐日大使館間的重要溝通管道。

同時期，面臨社會動盪不安，留學生們以維護本身權益與互相扶助為目的，分別有以臺灣省籍學生為中心組成的臺灣學生聯盟，與來自中國各省留日學生組成的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東京同學會。隨後以東京同學會為中心，各地也紛紛設立同學會，進一步在 1946 年 5 月成立中華民國留日同學總會（以下簡稱「留日同學總會」）。至 1946 年 12 月 23 日，臺灣學生聯盟正式合併入東京同學會及留日同學總會。<sup>20</sup>

當時中華民國的僑務管理，分為華僑與留學生兩部分。華僑與留學生雖然接受駐日代表團指導，但其中部分在戰前接受社會主義思潮或對國民黨政府不滿者，他們對參與華僑活動較為積極，成為帶領華僑與留學生向國民黨政府抗議的先驅。約於此前後，駐日代表團也注意到華僑的左傾問題。如 1947 年 3 月，留日華僑總會瞿絡琛副僑務處長在第九次全體委員會中談到華僑選舉問題時，表示：「國防部」注意到總會、聯合會組織問題，首先要考慮到會章的完備、人物及出身省籍等，必須進行最合理的民主選舉。<sup>21</sup> 又據說駐日代表團因不當處理承諾要做為留學生救濟金的賠償物資，造成其售款款項流程不明，或有將救濟金做政治利用，使留學生之間產生分裂、生活愈發陷入困境等情事發生，對國民黨政府帶來負面的影響。<sup>22</sup>

1947 年前後的日本華僑社會情況如此，「祖國」也正處於國共內戰期間。就在這一年的 2 月 27 日，因臺北專賣局員查緝私煙導致臺灣全島性動亂的二二八事件，衝擊日本華僑，導致華僑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二二八事件是否為促使華僑社會發生變遷的轉捩點呢？根據外交部檔案記載：

<sup>19</sup>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 233。

<sup>20</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54-60。

<sup>21</sup> 〈僑胞に經常税の義務 臨時税に關係がない 瞿僑務副處長が談話發表〉，《中華日報》249（1947 年 3 月 22 日）。

<sup>22</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70-72。

……自國民政府被中共逐出大陸，逃至臺灣，大陸出身之華僑及台灣出身之一部分知識階級分子與學生，便開始向左轉。助長此傾向者為二二八事件。……<sup>23</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與此記載相對應的是，事件發生後由東京華僑聯合會副會長楊春松、<sup>24</sup> 駐日代表團的謝南光、<sup>25</sup> 李秉漢及瞿珞琛〔按：與瞿絡琛應為同一人〕等人發起，在留日華僑總會內成立「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舉發陳儀與國民黨的惡政，呼籲追究當事人責任，尊重臺灣同胞的基本人權，並聯合志同道合人士對國民黨發出聯合署名的抗議書。<sup>26</sup> 接著在翌年 10 月，以在日臺灣人為中心組成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促會」），推選臺籍華僑劉明電為委員長。<sup>27</sup> 民促會主要在反對國民黨政府，視駐日代表團為國民黨獨裁的御用機關，打著反封建、反帝國、反官僚買辦「三反主義」的口號，以圖結成廣泛的民主戰線。<sup>28</sup>

另外，留日同學總會及東京同學會方面也受到二二八事件與國共內戰影響，反國民黨政府傾向逐漸增強。首先，東京同學會在 1947 年 6 月 7 日的會議中，以壓倒性的多數，決議召開「內紛反對學生大會」，並且提出停止對立、重開政治協商會議、立即釋放被逮捕的大學教授與學生、反對外國干涉國內政治的四項

<sup>23</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駐日大使館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大字第三七四三號代電抄件」，〈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61/0010。

<sup>24</sup> 楊春松（1899-1962），臺灣桃園人。因受日本統治的民族差別待遇及農民壓迫，1926 年在武漢參加中國共產黨後，於臺灣積極從事農民組合運動。1928 年加入臺灣共產黨。1932 年因參加上海臺灣反帝同盟而被逮捕，在臺灣服獄 6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赴日本任東京華僑聯合會副會長，並展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1950 年到中國大陸，擔任廖承志的左右手，負責對日工作。參見楊國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露滿堂，1999）；安藤彦太郎，《虹の墓標：私の日中關係史》（東京：勁草書房，1995），頁 251。

<sup>25</sup> 謝南光（原名謝春木，1902-1969），臺灣彰化人。1921 年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其間投入抗日民族運動。其後任《臺灣民報》記者外兼臺灣民眾黨幹部。1931 年後赴中國從事臺灣復歸祖國運動，並改名謝南光。1949 年任駐日代表團文化組副組長。1951 年渡海至中國，其後任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特別邀請人士）、中國亞洲團結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參見何義麟，《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頁 316；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霞山會編，《現代中国人名辞典（1966 年版）》（東京：霞山會，1966），頁 381-382。

<sup>26</sup> 楊國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頁 153。

<sup>27</sup> 楊國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頁 155；陳來幸〈戰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建と構造変化：台湾人の頭頭と錯綜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的帰属意識〉，頁 199、202。

<sup>28</sup> 不著撰人，〈中共貿易を擔う人々：業者・華僑・政黨をめぐって〉，《潮流》4:8（1949 年 8 月），頁 51。



主張。<sup>29</sup> 接著，留日同學總會在其機關誌《中國留日學生報》中，顯現對即將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期待。又在同年 10 月 17 日，與民促會同時間成立的有，由 30 多名青年組成民主中國研究會（以下簡稱「民中研」），其事務所設在同學會〔按：不明〕內，<sup>30</sup> 是以留日同學會為中心組成的研究會。民中研的任務在使青年正確瞭解「祖國」中國的革命運動，建立正確的世界觀，為此，由同學會文化部經常舉行具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議題的研究發表及討論會等文化啟蒙活動，來促使青年支持即將成立的新中國。<sup>31</sup> 由以上的變化來看，可以推測同學會內部在對國共兩方的支持立場上應已產生分歧。

回到駐日代表團欲進行華僑總會的改組問題上。儘管此時臺灣因二二八事件動盪不安，但駐日代表團仍繼續進行華僑總會全體代表的選舉，結果有如下的情形。首先，為選出參加華僑總會的代表，東京華僑聯合會先行於 4 月舉行代表選舉，其結果在 1,660 投票數中以劉明電獲得 442 票最高票數。<sup>32</sup> 在推出各區代表後，接著 5 月在靜岡縣伊東召開留日華僑總會全國代表大會，會中分別選出會長黃廷富，副會長孫步英、甘文芳、博定三人。<sup>33</sup> 在這些人物中，劉明電為臺灣臺南柳營人，先後赴日本、歐洲求學，取得經濟學、哲學博士學位，是一位馬克斯主義學者，在 1930 年返臺從事社會運動，參與創立《臺灣新民報》並任取締役，以及嘉南大圳會議的常任委員、臺灣米擁護協會的專務理事等職，1936 年再渡日，戰後成為華僑社會的僑領。<sup>34</sup> 黃廷富為臺灣臺北人，九州大學法學部、京都大學大學院法科畢業後，在關西大學、立命館大學教授政治學。甘文芳，臺灣彰化人，1922 年臺北醫專畢業後即投入社會運動，經常在《臺灣青年》、《民報》上投稿發表文章，但在 1939 年擔任虎尾商工會會長時，因對抗日本官憲遭受壓迫

<sup>29</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72-77；〈東京同學會で『内紛反對學生』大會開催〉，《中華日報》422（1947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sup>30</sup> 〈民主的華僑學生團體同時に誕生〉，《中國留日學生報》24（1948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sup>31</sup> 〈正しい認識に基く實踐、民中研の動き活潑 全華僑留學生の民主的團體へ〉，《中國留日學生報》26（1949 年 2 月 1 日），第 3 版。

<sup>32</sup> 〈新聞人揃って當選：華總東京代表選舉〉，《中華日報》375（1947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

<sup>33</sup> 〈留日華僑總會の正副會長決る〉，《中華日報》390（1947 年 5 月 13 日），第 2 版；孫步英，廣東省人，依幾項資料判斷其政治傾向為支持國民黨。其中一項，是依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內政部調查局編印，〈匪大阪華商會議所籌設經過調查專報〉，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元月十五日」，〈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61/0009。

<sup>34</sup> 〈在日華僑隨一の經濟學者 劉明電氏〉，《中國通訊》250（1947 年 10 月 21 日），頁 19。

而赴日本就讀慶應大學。<sup>35</sup> 從這些人物的經歷來看，可說駐日代表團指導下選出的留日華僑總會幹部，都是擁有高學歷，對華僑社會影響很大的人物。進一步來說，在 1920 年代抗日運動中由於民族自決意識高漲，社會主義思潮廣受青年接受的氛圍中，可以看出臺灣人劉明電、甘文芳都是受其影響，於二二八事件後參加民促會，在對抗國民黨政府中顯露頭角的人物。<sup>36</sup> 另外，前留日同學總會主席博定（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被推為副會長，<sup>37</sup> 也可窺見留日同學總會與留日華僑總會間的緊密關係。總之，由此次選舉結果來看，駐日代表團對華僑團體的改組無疑遭受挫敗，也為日後的分裂埋下伏筆。至於民促會在東京華僑聯合會佔有的勢力，以 1949 年 4 月的情形來說，其在 46 名的執監委員中佔有 19 名，若包含同情民促會者則已過半數達 24 名，於是在會長改選時民促派僅以 3 票之差敗給國民黨派的林以文。<sup>38</sup> 說明東京華僑聯合會內國民黨與民促會兩派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這樣的情形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支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勢力滲透進留日華僑總會，思以再改組來防止繼續惡化。1951 年 1 月，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以東京華僑聯合會副會長陳焜旺<sup>39</sup> 使用東京華僑聯合會機關誌名義任意發行旬刊《華僑新聞》，其內容批評盟軍佔領當局，且有愛戴「新祖

<sup>35</sup> 〈留日華僑總會の正副會長決る〉、〈真の中日親善を黄新會長、抱負を語る〉、《中華日報》390（1947 年 5 月 13 日），第 2 版。甘文芳，臺北醫專畢業。東京華僑聯合會執行委員。歷任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委員長、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1956 年 1 月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特別邀請人士（未出席）。在東京開設文芳醫院外，並任華僑醫師會會長，及東京華僑總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理事、中國研究所評議員。參見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霞閣會編，《現代中国人名辞典（1962 年版）》（東京：外交時報社，1962），頁 105-106。

<sup>36</sup> 楊国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頁 153。

<sup>37</sup> 〈博定氏副會長に〉，《中華留日學生報》6（1947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sup>38</sup> 不著撰人，〈中共貿易を擔う人々：業者・華僑・政党をめぐる〉，頁 52。林以文（1913-1976），臺灣臺中霧峰林錦順的三子，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二次大戰後創立惠通公司，經營不動產、電影院、夜總會、彈珠房等娛樂事業外，也經營中華料理店及海外投資。1952 年任中華民國東京華僑總會會長，後為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會長。1973 年及 1975 年當選中華民國僑選立法委員。參見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霞山會編，《現代中国人名辞典（1966 年版）》，頁 1156；陳炎正主編，《霧峰鄉志》（臺中：霧峰鄉公所，1993），頁 304；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2002），頁 834。

<sup>39</sup> 陳焜旺（1923-），臺灣臺中人。1941 年赴日，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歷任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會長，以及 1999 年成立的中共系留日華僑聯合總會首任會長等職。現任長崎孔子廟中國歷代博物館理事長、留日臺灣省民會及日中友好會館的理事職務，另亦任橫濱山中中華學校顧問理事、中國華僑大學、暨南大學的董事。參見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 519。

國（中國）」字樣，顯然違反佔領政策，欲以解除其副會長職務來追究責任，成為點燃兩派分裂的導火線。<sup>40</sup>

接著3月時，駐日代表團開始著手正式改組留日華僑總會。其做法是將新的華僑總會名稱改為中華民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各地的華僑聯合會則冠上地名改稱為華僑總會。<sup>41</sup> 在新的選舉辦法方面，從具選舉資格的會員到推薦人、候選人的經歷皆須經過僑務處的事前審查。<sup>42</sup> 但在進行新的東京華僑總會選舉之際，卻由駐日代表團不承認的陳焜旺、于恩洋、陳文貴、曾森茂四人高票當選理監事，且在理監事會議上選出會長康鳴球，<sup>43</sup> 副會長劉永鑫及陳焜旺。由於此結果完全背離駐日代表團的期望，因而被宣布解散，重組新的選舉委員會，在9月選出駐日代表團認定的新會長康啟楷與其他幹部成員。<sup>44</sup> 一方面康鳴球等人則另組織新的東京華僑總會，由林木堂負責與北京政府聯絡，成為北京政府在日本的代表機關。<sup>45</sup> 新的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成立後，在隔年召開僑民大會時，出席者已達2,000名之眾；另外，在東京設有中國經濟合作社、新僑信用組合、池袋華僑福利合作社、東京華僑福利合作社4處金融合作社，以及悅來莊自治會、臺東自治會、城南自治會、町田町自治會、荻窪自治會、川崎市自治會、橫濱市自治會等7個自治會，<sup>46</sup> 其規模已與中華民國政府所支持的華僑總會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sup>40</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民促特報／代表團對僑會不當干涉、要求東聯副會長辭職務！！及『華僑新聞』違反占領原則」、「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快郵代電（中華民國40年2月10日發）」，〈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4。

<sup>41</sup> 盧冠羣，《日本華僑經濟》，頁33；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79。

<sup>42</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82-284。

<sup>43</sup> 康鳴球，臺灣高雄人。在臺灣的中學畢業後渡日，畢業於日本的私立大學。歷任東京華僑聯合會執行委員、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委員、中央華僑商工公會會長、機械製造業大和工業株式會社社長。1954年9月任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華僑代表。1955年7月，再次當選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會長。另外，在經營中華料理店外，也擔任中央華僑商工會顧問、協同組合日本華僑經濟合作社理事等職。參見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霞山會編，《現代中国人名辭典（1966年版）》，頁316。

<sup>44</sup> 〈東京華僑總會的糾紛〉，《華僑文化》35（1951年10月1日），頁12；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76-2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

<sup>45</sup> 林木堂乃謝南光之同鄉親友，林曾任臺灣第一銀行董事。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編，《中共分析》（東京：該課，1956），頁102。

<sup>46</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

華僑團體分裂後，其後續伴隨而來的影響逐步蔓延開來。1951年10月，留日同學總會同樣也分裂為臺灣方面的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東京同學會（港區麻布廣尾町）與北京政府方面的中國留日同學總會（千代田區東方學會）。<sup>47</sup> 分裂後的中共系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係受民促會之指示而成立，並配合中共派遣人員指示，收集情報及發行機關誌《中國留日學生報》，向留學生與華僑進行宣傳；1952年，在接受中共濟助的60萬美金後，於同年10月5、6兩日的同學總會全國大會中，通過〈中國人民政府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撥來救濟留學生款項如何配分〉的議決，並向「祖國（中國）」感謝，宣誓效忠。<sup>48</sup> 戰後留學生在日本的最大困境之一為生活問題，因此通過這樣的救濟金發放，想必對吸收留學生的向心力發揮了作用。

此外，各地同鄉會也似有逐漸出現兩派對立情形。1952年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至橫濱中華學校參加雙十節祝賀式典時，認為該校已受到「左派」教育影響，乃於1953年開始進行改組，兩方激烈對立的結果最後導致僑校分裂。<sup>49</sup>

## （二）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與親中日本人團體

如前所述，以臺灣二二八事件為契機在東京組成左傾團體的民促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佔有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扮演帶領各地組織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華僑團體，以及展開宣傳社會主義中國政權即將成立的火車頭。另一方面，在北京政府成立前後，與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組成的團體或其相關連的親中日本人團體，展開各種貿易、文化活動。有關民促會成立初期的發展和與親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團體聯絡情形，由以下外交部檔案在1953年5月的調查報告中來略述其梗概。<sup>50</sup>

<sup>47</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駐日大使館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大字第三七四三號代電抄件」，〈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10；須山卓，《華僑社會：勢力と生態》（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55），頁112-113。

<sup>48</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

<sup>49</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駐日大使館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大字第三七四三號代電抄件」，〈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10。

<sup>50</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送『留日華僑左傾團體概況』敬祈鑒核（中華民國42年5月8日發文）」，〈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61/0006。

首先，民促會在反國民黨政府方面，以在日華僑的處境為訴求來爭取認同。戰後初期日本社會百廢待舉中，華僑雖以戰勝國國民身分在物資配給、法律等方面獲得較多特權，但隨著日本逐漸走向復興，政治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中，華僑無論在日本的社會地位、商業活動等方面卻逐漸受到限制。加上國民黨政府在發放留學生獎學金與管理華僑學校教育方面有多項措施處理不當，於是這些現實上的問題成為民促會用以「訓練」華僑認識當前的環境困境，以喚起華僑自覺，來共同改善這種不合理的體制，進一步達到支持即將成立新中國政權之目標。在以上的背景下，民促會提出的主要項目如下：即對日本政府方面的控訴，有對華僑課重稅、日本銀行對中國人不放款和限制貿易發展、日本政府不保護留學生等，主要在強調中國人受到差別待遇之苦。對駐日代表團方面，則有停發留學生獎學金、強迫干涉華僑學校教育等指控及作反蔣宣傳。

此外，為宣傳民促會的理念，民促會也發行機關誌如《華僑民報》、《民促會報》、《民促速報》等刊物，<sup>51</sup> 內容為批判國民黨，宣傳中國共產黨。由於民促會成立後，與國民黨政府的對立逐漸表面化，因此國民黨政府視此團體為戰後左傾華僑團體中最尖銳者。

繼民促會成立後的親中團體則是具有日共背景的日本人團體。

於 1949 年 8 月創立的日中貿易促進會（1950 年改稱，創立時為中日貿易促進會），其成員是以日共黨員為中心，並獲得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研究所協助。<sup>52</sup> 由於該會所有一切活動完全由日共策畫，初期在推展對中關係上為隱藏其政治目的，又考量親善活動不易發展，唯有推動經濟關係，才能招徠中小實業及政界參加，因此從貿易關係著手發展對中關係，然後逐漸做到政治、文化、社會組織等的交流。

日中貿易促進會在促進中日間貿易交流的訴求下，甫成立即獲得留日華僑總會會長黃廷富、民促會委員長劉明電及林炳松、留日同學總會等華僑支持。至 1953

<sup>51</sup> 現存《華僑民報》1 號（1949 年 7 月 11 日）-8 號（1949 年 10 月 11 日）；《民促速報》有 1951 年 3 月 12 日、同年 3 月 27 日、年不詳 2 月 28 日；《民促會報》有 No.2（1951 年 2 月 27 日）、No.3（1951 年 3 月 12 日）、No.4（1951 年 4 月 2 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sup>52</sup> 1946 年 1 月成立的中國研究所，首任所長為平野義太郎（1897-1980）。平野義太郎亦任 1950 年 10 月成立的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及 1952 年 5 月組成的日中貿易促進會議議長。參見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人名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頁 485。

年，廣泛得到東京、神奈川、大阪、兵庫、名古屋、新潟等地有力華僑的支持，其中亦有具各地華僑總會幹部身分的華僑。此外，中國為聲援此會，也在上海設立對日貿易促進會總部，並在東京、上海、廣東、香港等地置聯絡處。成立雖不及4年，其組織已在日本和中國各地建立據點，可說已頗具規模。

另外，在具體活動方面，為突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限制，與中國成立中日漁業協定，並以其設立的公益合作社，對中國提供漁船、技術員等協助。同時在第三回全國大會會議時，與中共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及中國進出口公司合作，來改善貿易限制的障礙。透過民促會中央委員呂漱石（中國經濟合作社社長）主持的大安工業公司，斡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外，也成為日共對外聯絡的管道。此外也以演講會、文字宣傳、各團體之通信調查等活動及設立日本國際貿易委員會來拓展對外關係。

此外，屬於日共外圍團體的日本中國友好協會（以下簡稱「日中友好協會」），則是以文化交流促進中日民族友好為目的，網羅了各階層與不同政治信念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在1950年正式成立自發的國民文化團體。其主要活動在與民促會合作，透過其文化事業如發行機關誌《日本與中國》、《中國事情》、《中日貿易通信》，播放幻燈片、電影如《長征二萬五千里》、《毛澤東》、《中共三十年史》、《北京五一節》、《花岡事件》等，並以懇談會等方式來介紹和研究中國、日本現況、派遣友好使節與文化，及促進中日貿易。此外，有關中日間的人道交流也是其主要事業之一，如組織國民救援會與宋慶齡主持的中國人民救濟總署聯絡，匯款援助在中國的日僑，並與民促會一起進行中國人俘虜殉難者遺骨調查與送還活動。進一步從1953年開始，協助在中國的日僑歸國、中國釋放日本戰犯的遣返、戰爭中在中國死亡的日本人遺骨的調查與送還、華僑集體歸國與中國人俘虜殉難者遺骨送還等活動。

以上為與民促會成立初期有密切關係的兩團體，除此以外，在1949年另外也與日中貿易促進會（創立時稱中日貿易促進會）、日中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創立時稱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等團體聯絡，推動與中國間的交流。在此基礎下，與中國展開交流的日本人團體逐漸增加，至1954年中國調整對日政策後，有更多的親中日本人團體或日共外圍團體至中國訪問，逐漸發展為無法阻擋的潮流。

### （三）1954 年中國對日政策的轉向

儘管在北京政權成立前已有親中日本人團體與中國來往，但戰後北京政府在對日外交上仍採取敵視政策。中國在 1950 年與蘇聯簽訂以日本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其後參與韓戰，再加上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這些事件讓雙方始終處於對立狀態，除了少量的貿易往來外，幾乎停止了所有的人事交流，甚至由於雙方缺乏政治上的對話，而留下圍繞在雙方領海問題上所衍發的漁業糾紛，以及因戰爭遺留下的僑民歸國與戰爭犧牲者遺骨送還等懸而未決的問題。

但隨著 1953 年韓戰停戰，中國開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與調整外交政策。1954 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sup>53</sup> 即為宣示中國調整對外關係的開始。接著在 9 月 23 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中日關係正常化是兩國人民共同的願望。繼之在 10 月 12 日，簽訂中蘇〈關於對日關係的聯合宣言〉，主張「……中蘇兩國政府根據互惠條件，與日本發展廣泛的貿易關係，並同日本建立緊密的文化聯繫……」，來建立與日本的關係正常化。<sup>54</sup> 強調透過經貿文化關係來建立中日友好關係，說明中國的對日政策由敵視轉為和平攻勢，以達成中日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為有效推進中日關係，北京政府以 1950 年代開始陸續成立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1966 年後改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以及從事人道支援的中國紅十字會等這類「民間」團體加強對外交流，以降低政治色彩。<sup>55</sup> 此外，也在北京設立秘密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所，負責收集情報與做情勢判斷，可見其重視對日關係的程度。<sup>56</sup>

而中國之所以有必要調整對日政策，實與當時雙方關係近乎停滯的狀態有關。如前所述，在中日緊張對立時期，實已經由「非官方」方式在 1952 年及 1953 年分別簽訂兩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中日兩方各價值 3,000 萬英鎊之易貨交

<sup>53</sup> 1954 年 6 月下旬，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在訪問印度時，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參見張篷舟主編，《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第四卷：1946-1958，頁 409。

<sup>54</sup> アジア政経学会編，《中国政治経済綜覧（昭和 35 年度版）》（東京：一橋書房，1960），頁 338-339。

<sup>55</sup> 別枝行夫，〈戰後日中關係と中国外交官（その 1）〉，《北東アジア研究》2（2001 年 10 月），頁 179-180。

<sup>56</sup>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編，《中共分析》，頁 104。

易)，但由於韓戰時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導致實際貿易的達成率僅有 5.1% 與 38.8%，並不十分理想。<sup>57</sup> 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如何進一步打開與日本關係的問題已迫在眉睫。於是在 1952 年由北京政府主動向日本提出送返日僑的問題，並開始進行交涉。終在 1953 年 3 月 5 日，中國紅十字會與北京政府指定的日本紅十字會、日本平和聯絡委員會、日中友好協會三團體間簽訂送返在中國日本僑民的〈關於商洽協助日僑回國問題的公報〉。在這同時，北京政府也對日方提出利用載送日僑的船隻來運送希望返回中國的華僑，於是華僑集體歸國也在 6 月 27 日開始第一次輸送。<sup>58</sup> 就這樣，除了貿易交流外，再以「人道」交流促進雙方的接觸，增進彼此交流的幅度。<sup>59</sup>

具體來說，送返日僑活動從同年的 3 月 23 日開始至 10 月 14 日第七次結束後，日本紅十字會為履行當初與中國紅十字會的非正式協議，在例行代表會中達成邀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的決議。經日本國會通過後，代表團於 1954 年 10 月 30 日在團長李德全率領下，展開為期兩星期的訪日之旅。由於這是北京政府成立後首次的訪日中國「民間」團體，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除接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招待外，因送返日僑歸國所衍生出來的諸如釋放日本戰犯、漁船糾紛、貿易等問題也成為此次中國紅十字會訪日時，與日本方面進行協商的項目之一。因此代表團在接受日本紅十字會招待時，除交予日本紅十字會《日本侵華戰爭罪犯名冊》與《日本侵華戰爭罪犯死亡名冊》外，在各地與日本人團體進行懇談時，也強調中日貿易重開的重要性。<sup>60</sup> 這樣種種對日親善的舉動受到日本媒體關注，連續多天登上報紙重要版面，成功提升日本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印象。<sup>61</sup> 另外，代表團也參加在淺草東本願寺舉行的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祭，並接受東京及各地華僑協商會議的招待以及與華僑會面和懇談。在戰後中日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北京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訪日中

<sup>57</sup> アジア政経学会編，《中国政治経済綜覧（昭和 35 年度版）》，頁 633。

<sup>58</sup> 厚生省援護局編，《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東京：厚生省，1977），頁 157。

<sup>59</sup> 大澤武司由當時的背景來分析，提出由於中日經貿關係陷於膠著，因此以「人道交流」方式做側面支援的看法。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關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頁 55。

<sup>60</sup> 厚生省援護局編，《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頁 110-111；波多野勝、飯森明子，〈李德全訪日をめぐる日中關係〉，頁 4-12。

<sup>61</sup> 波多野勝、飯森明子，〈李德全訪日をめぐる日中關係〉，頁 10；另請參照 1954 年 10 月份《神戸新聞》。



國團體，在訪問時強調中日雙方關係和與華僑間的互動，實已超越以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的訪日範圍。

中國對日的和平攻勢，除進行「人道」交流外，從 1954 年開始，北京政府以邀請日本國會議員、文化代表、婦人代表團等參加國慶節為起點，此後舉凡經濟、文化、藝術、科學、宗教、體育等方面，都進行了活躍的交流。甚至 1955 年簽訂「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地點也是在東京。至 1957 年，訪中的日本人達 1,243 人，是為歷年之最。<sup>62</sup> 可見中國以恢復中日邦交的目標，由經貿、文化交流開始的這種「逐漸累積」方式，也讓日本社會期待擴大對中國貿易，可以肯定對日本政府帶來一定的壓力。

就在中日民間往來最高潮時，中國也因 1958 年起著手進行第二個五年計畫，希望藉由簽訂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來尋求更長期穩定的關係，然而在 1958 年 5 月 2 日，發生日中友好協會在長崎主辦的郵票剪紙展覽會場上，日本的右翼團體撤下中國國旗，引發所謂的「長崎國旗」事件，導致中日間所有活動全部中斷。<sup>63</sup> 據統計，因中日貿易斷絕而取消的輸出入契約總額達 9,700 萬美元，影響到的相關商社約 400 家、相關廠商約 200 家。<sup>64</sup>

中日貿易中斷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不利的影響是無庸置疑，但北京政府開始拒絕日本「政經分離」的對「中」模式，重申「政經不可分」原則，說明中國欲以此為契機來取回對日外交主導權的意圖。1958 年 8 月，日本社會黨訪中團在訪問中國之際，北京政府提出對日要求：即中止敵視中國之言論與行動、停止製造兩個中國之陰謀、不得妨礙恢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政治三原則」。<sup>65</sup> 1960 年岸信介首相下臺，池田勇人出任首相，周恩來對正在訪問中國的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表示，重開日中貿易，須遵守發表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的對日「貿易三原則」。<sup>66</sup> 至 1962 年 11 月，廖承志與自民黨的高碕達之助進

<sup>62</sup> 中國研究所編，《新中国年鑑（1966 年版）》（東京：極東書店，1966），頁 397。

<sup>63</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新版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662。

<sup>64</sup> アジア政経学会編，《中国政治経済綜覧（昭和 35 年度版）》，頁 628。

<sup>65</sup> 〈佐多忠隆社会党議員の中国訪問に関する報告書（1958 年 8 月 29 日）〉，收於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東京：霞山會，1970），頁 144-151。

<sup>66</sup> 〈周恩来総理の鈴木一雄日中貿易促進理事に対する談話（いわゆる「対日貿易三原則」）（1960 年 8 月 27 日）〉，收於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頁 178-180。

一步簽訂具有政府背景支持下的分期付款、貸款等經濟協定，與互設聯絡處、互派記者協議等具政府間協定性質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此無異是將中日關係由民間提升至政府層面的一大突破性做法。<sup>67</sup> 從以上的幾個階段來看，長崎國旗事件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日趨強硬，也間接說明自 1954 年以來進行「民間」形式的「逐漸累積」對日外交政策，在中日關係的推動上確已收到效果。

### 三、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的組織與活動

#### (一) 背景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日臺灣人不屬於華僑社會的範疇，加上中日兩國交戰，影響華僑人口的移動，再者進入二次大戰末期後，日本帝國將中國人「強制連行（強行俘虜）」到日本炭坑、礦山等地勞動，使得在日中國人人數急速增加。另方面，許多臺灣人也以少年工、徵用工等身分來到日本。在此背景下，1945 年戰爭結束後，隨著送返作業以及在日臺灣人的僑民登記暫告一段落後，日本華僑人口始漸趨穩定。因此，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變化與人口結構的改變有密切關係。

根據法務省調查華僑人數的統計資料，戰後華僑集中都市的第一、二位分別為東京及神戶。由表一可看出戰後至 1950 年代末神戶華僑與在日臺灣人的變化。

表一 戰後至 1950 年代神戶華僑與在日臺灣人的人口變遷

單位：人

| 年    | 全國     |        |        | 東京     |       |       | 兵庫（神戶） |       |       |
|------|--------|--------|--------|--------|-------|-------|--------|-------|-------|
|      | 總計     | 中國     | 臺灣     | 總計     | 中國    | 臺灣    | 總計     | 中國    | 臺灣    |
| 1948 | 33,148 | 19,715 | 13,433 | 6,626  | 2,769 | 3,857 | 6,806  | 3,743 | 3,063 |
| 1950 | 38,281 | 21,506 | 16,775 | 8,933  | 3,573 | 5,360 | 7,853  | 4,228 | 3,625 |
| 1959 | 44,599 | 23,606 | 20,993 | 13,294 | 5,559 | 7,735 | 8,385  | 4,498 | 3,887 |

資料來源：統計委員會事務局、總理府統計局編，《日本統計年鑑（第一回）》（東京：日本統計協會、每日新聞社，1949），頁 82；總理府統計局編，《日本統計年鑑（第二回）》（東京：日本統計協會、每日新聞社，1951），頁 32。

說明：1. 1948 年調查截止時間為 1947 年 9 月-1948 年 2 月末；1950 年調查截止時間為 1950 年 2 月末；1959 年調查截止時間為 1959 年 4 月 1 日。

2. 神戶的人數實為兵庫縣的人口統計。

3. 1959 年的中國人統計數字，包含香港與中國本土以外的海外中國人。

<sup>67</sup> 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史：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 199-206。

神戶在開港後即為日本對外重要通商港口之一，一直以來是華僑活動的重要據點。隨著戰爭結束，許多赴海外充當日本軍屬與徵用工的臺灣人隨日本復員軍人在日本上岸後，聚集神戶等待機會返鄉，因此集合了人數眾多的華僑與臺灣人，為華僑集中都市的第一位。雖然隨後即由東京取而代之，但至 1950 年代末，神戶華僑人口僅次於東京。由第一、二位的東京、神戶為代表來看，臺灣人已達該地華僑人口半數或過半數，可說暗示了戰後在日臺灣人取得華僑社會僑領的背景因素。

由於神戶為對外重要貿易通商港口，華僑集中神戶經營商業貿易活動，逐漸形成華僑社會。依據 1930 年的國勢調查，神戶華僑人口 8,219 人，居日本全國第一位。<sup>68</sup> 若進一步來看神戶華商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所佔的位置，如前言所述，戰前中國已為日本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而神戶開港後，因其優良港口的地理條件，在戰前已發展為對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主要港口。在九一八事變前一年的 1930 年，神戶港的輸出入總額已占全國的 36%，其中神戶對華南與東南亞的輸出額中，神戶華商的交易量達到約佔 50%，顯見其重要性。神戶華商掌握這種對外貿易的優勢，至盧溝橋事變後才衰落下來。<sup>69</sup> 另一方面，同時期 1930 年的在日臺灣人與華僑人口分布，有截然不同的面貌。此時，在日臺灣人於主要都市的人口分布為：東京 2,492 人、兵庫（神戶）473 人、京都 416 人、大阪 181 人、神奈川（橫濱）56 人。<sup>70</sup> 雖然，截至目前有關日本統治時期在日臺灣人於日本的整體活動研究仍缺乏，但可推測在日臺灣人應是以學生或商人身份為主，且特別集中於東京，並與其他都市呈現很大的落差。可見，由於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影響，來到日本的臺灣人，是集中在日本內地就學地區，或如神戶這類與海運航路有聯繫的都市。

<sup>68</sup> 調查時間為 1930 年 10 月 1 日。神戶的人數實為兵庫縣的人口統計。（內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國統計年鑑》〔東京：東京リプリント出版社，1966〕，第 54 回：1935 年復刻版，頁 45。）不過在《落地生根》一書中的統計，依據《國勢調查集大成：人口統計總覽》記載 1930 年的兵庫（神戶）的華僑人口為 6,780 人。（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頁 398-399。）本文採《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的統計。

<sup>69</sup> 籠谷直人，〈日中全面戦争後の在日本華僑・印僑ネットワーク〉，收於倉沢愛子等編集，《支配と暴力》（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66；安井三吉，〈神戶華僑と近代日中關係〉，收於鈴木正崇編，《東アジアの近代と日本》（東京：慶応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2007），頁 72-73。

<sup>70</sup> 調查時間為 1930 年 10 月 1 日。橫濱的人數實為神奈川縣的人口統計；神戶的人數實為兵庫縣的人口統計。內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第 54 回：1935 年復刻版，頁 45。

受限資料以及相關研究的不足，尚未能窺見日治時期臺灣人移入神戶的變遷歷程。然而由於神戶為臺日間臺灣總督府指定開設的「命令（指定）航路」，反映其作為商業聚集地的優位性，故移入神戶的臺灣人是以商人為主。也因此《落地生根》一書中指出，<sup>71</sup> 此時有不少臺灣的貿易商社加入福建公所，而以臺灣作為活動據點的福建公所的會員也很多，兩者間的界線難以清楚區分。另一方面，1930年代為神戶臺灣商人經營臺灣帽子業的興盛期，<sup>72</sup> 故約在此時也成立有臺灣帽子聯盟會、及結合神戶的臺灣商人組成的神戶臺灣商工會。<sup>73</sup> 顯示戰前在神戶的華僑與臺灣人即是以商業活動為主的特色。戰後至 1950 年代末，神戶華僑人口始終維持在 7、8 千人。其中日治時期的臺灣人雖為少數，但到戰後顯著增加，這樣人口結構的嬗變對神戶華僑社會的影響，即可由戰後成立的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以下簡稱「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來探討。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遭受美軍空襲的神戶幾成廢墟，華僑的生活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是以為了相互扶助，以廣東省籍青年為中心的神戶中華青年會（以下簡稱「中華青年會」）與臺灣省民會兩團體相繼誕生。有鑒於戰後日本社會的狀況，關係到全體華僑物資與糧食配給的生活問題，乃至華僑教育等皆需要一個統整的華僑機關來統籌帷幄，不久在 10 月 3 日，成立全日本最早的華僑自治團體神戶華僑總會。<sup>74</sup> 隔年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成立之際，神戶華僑代表亦通過決議將臺灣省民會併入神戶華僑總會，兩團體的合併可說是華僑社會發展的一個新的轉折點。<sup>75</sup>

回顧臺灣省民會時期，為協助在神戶的臺灣人恢復原有的生活秩序，在會長陳義方<sup>76</sup> 領導下，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兵庫縣政府官廳進行各種交涉，也因

<sup>71</sup>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会館の百年》，頁 118。

<sup>72</sup> 堀内義隆，〈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2008 年 12 月），頁 26-53。

<sup>73</sup> 許瓊丰，〈戰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戶華僑社会を中心に〉（兵庫：日本兵庫県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9），頁 64。

<sup>74</sup> 〈互いに助け合はう 中國、朝鮮人との理解も深まる、過去の一切を水に流し〉，《神戸新聞》，1945 年 12 月 8 日，第 4 版。

<sup>75</sup> 〈華僑總會と台湾省民會合併 神戶代表東上〉，《神戸新聞》，1946 年 4 月 15 日。

<sup>76</sup> 陳義方（1897-1972），臺灣苗栗苑裡人。戰前是經營臺灣帽子業等的義豐商會代表。戰後活躍於神戶華僑社會，歷經臺灣省民會會長、神戶華僑總會副會長及會長、神戶華僑信用金庫副理事長、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會長、神戶華僑聯誼會會長等職。政治立場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見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 445、516。

此奠定了戰後臺灣人同鄉團體的基礎。於是在臺灣省民會併入神戶華僑總會後，以兵庫縣（神戶）的臺灣人為主，約在 1947 年時，另組織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以下，由其留存資料可以整理出幾項有關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組織與活動的具體情形。

## （二）組織結構與特色

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幹部的組成特色，對照表二及表三可窺見其組織型態。由表二可知，臺北縣出身的人數最多，然而由於日治時期的臺中縣、新竹縣皆為臺灣帽子產業的重鎮，而神戶又為臺灣帽子輸移出的集散地，因此幹部的籍貫分布顯然與職業種類和居住神戶的人數有密切關係。此外幹部全體從事商業，突顯戰後神戶華僑以商業活動為中心的特色。而該會會長由前臺灣省民會會長陳義方接任，可推測陳已累積了人望。由於資料缺乏，關於陳義方的經歷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陳除任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會長外，其後也擔任神戶華僑總會會長，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約於 1950 年辭去華僑總會會長一職，此後即以文化經濟協會為據點，致力於支持北京政府的活動，可知他在支持新中國活動這方面是如何活躍。<sup>77</sup> 而幹部中的林清木、林水永、陳通<sup>78</sup> 等也有強烈支持北京政府傾向。但另一方面，副會長王昭德<sup>79</sup> 則是最受中華民國政府重視的神戶華僑，從外交部檔案判斷其政治性格不強；其他如謝連春、葉兩儀、范根炎等也常見於參加中華民國政府舉辦的各式活動。

作為日本華僑社會中具代表性的臺灣人團體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的幹部，為何成立不久後逐漸演變為兩派不同的立場呢？首先，判斷約在 1947 年成立的文化經濟協會，應受到同年二二八事件的衝擊。其次，戰後國民黨政府在管理臺灣政策方面，對臺灣人的重視程度，也反映在駐日代表團職員上的任用。根據 1951

<sup>77</sup> 〈陳義方辭退神戶華僑總會々長 補選王昭德氏為新會長〉，《華僑文化》15（1950年2月1日），頁8。

<sup>78</sup> 陳通（子達、舊名登通，1896-？），臺灣臺北新莊人。臺灣公學校畢業後，曾就讀臺北工業講習所一段時間，後改主攻漢學。20歲左右獨自赴日，1934年與友人合資創立泰安公司。是神戶貿易界的重要人物。台灣新民報社編集，《台灣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9），頁270。

<sup>79</sup> 王昭德（1899-1963），臺灣臺中大甲人。戰前以經營臺灣帽子業的德明商店神戶支店代表來神戶，有擔任臺灣帽子聯盟會會長、神戶臺灣商工會會長、臺灣帽子興業株式會社社長等經歷。戰後除仍任德明商會代表外，亦擔任神戶華僑福利合作社董事長、神戶華僑信用金庫理事長、神戶華僑總會會長、日本華商貿易協會會長、神戶中華同文學校董事長等職務。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68。

年駐日代表團〈本團及僑務處懂日語臺語及臺籍人數表〉的分析，總計職員 106 名中臺籍人數僅有 3 名，僑務處中並無臺籍人員；其中懂日語的 39 名中僑務處佔 10 名；懂臺語的 7 名中僑務處僅佔 1 名。<sup>80</sup> 從這樣的職員分布對照戰後臺籍華僑在日本華僑的人數上來看，駐日代表團是否與華僑社會存有溝通上的問題，其對華僑管理方式有待進一步分析和研究。

其次，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的規模與人口結構方面。如表三所示，1947 年居住兵庫縣的臺灣人有 2,970 人，<sup>81</sup> 推測登錄會員數的 1,037 人若是以家庭為單位，則兵庫縣的臺灣人幾乎全部加入。由移出縣別來看，在兵庫縣人口中分居第一、二位的臺北縣與臺中縣佔總人數的 54%。日治時期由臺中縣與新竹縣來神戶的有多人為臺灣帽子商；<sup>82</sup> 其餘應為經營海產物、青果、雜貨等業為多。即，從戰後臺籍華僑的籍貫與戰前在神戶的臺灣商人在各商業領域奠下的基礎是否有關，還需要更精確的比對，但可以推測應有某種程度上的關連。另外，由表四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的人口年齡分布來看，以 20 年代與 30 年代的青年最多，約佔整體的 73%。再者，表五的職業分布中，在有職業登記的 535 人中，從事商業的人口最多，戰後在神戶居於領導地位的臺灣商人與戰前的情況相同，再次確認神戶商業都市的特性。

表二 1947 年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幹部名冊

| 幹部名稱 | 姓名  | 籍貫  | 職業        | 幹部名稱 | 姓名   | 籍貫  | 職業        |
|------|-----|-----|-----------|------|------|-----|-----------|
| 會長   | 陳義方 | 新竹縣 | 貿易商(原帽子商) | 理事   | 葉兩儀  | 臺北縣 | 貿易商       |
| 副會長  | 王昭德 | 臺中縣 | 貿易商(原帽子商) | 〃    | 葉德馨  | 臺北縣 | 貿易商       |
| 〃    | 林清木 | 臺中縣 | 商業        | 〃    | 陳通   | 臺北縣 | 貿易商       |
| 會計理事 | 黃萬居 | 臺中縣 | 貿易商(原帽子商) | 〃    | 黃頭   | 臺南縣 | 製菓商       |
| 理事   | 陳新喜 | 臺中縣 | 貿易商(原帽子商) | 〃    | 范根炎  | 新竹縣 | 商工業       |
| 〃    | 林水永 | 臺中縣 | 纖維品批發商    | 〃    | 吳金居  | 臺北縣 | 貿易商       |
| 〃    | 謝連春 | 臺南縣 | 貿易商       | 〃    | 歐清風  | 臺中縣 | 食料品、雜品批發商 |
| 〃    | 葉炎木 | 新竹縣 | 飲食業       | 合計   | 15 名 |     |           |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華僑文化經濟協會 1 (1947 年名簿)」，〈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23・2-3-1 製作而成。台灣新民報社編集，《台灣人名辭典》，頁 374-375。

<sup>80</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呈報本團通日語台語及台籍職員人數由 (中華民國 40 年 7 月 20 日發文)」，〈駐日代表團報告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914.2/0059。

<sup>81</sup> 經濟安定本部總裁官房企画部調查課，《在日華僑經濟實態調查報告書：昭和 22 年度調查總括》(東京：該課，1947)，華僑調查資料：第 3 号，頁 52。

<sup>82</sup> 依據 1943 年 11 月神戶臺灣商工會編的《會則及會員名》，當時 144 名會員中，可判斷出的帽子商約有 42 名。參見神戶臺灣商工會編，《會則及會員名》(神戶：神戶臺灣商工會，1943)。

表三 1947年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會員籍貫之分類概況

| 籍貫  | 人數  | 籍貫  | 人數    | 籍貫  | 人數  |
|-----|-----|-----|-------|-----|-----|
| 臺北縣 | 284 | 新竹縣 | 165   | 臺中縣 | 271 |
| 臺南縣 | 143 | 高雄縣 | 62    | 花蓮縣 | 9   |
| 臺東縣 | 4   | 澎湖縣 | 16    | 不明  | 83  |
| 合計  |     |     | 1,037 |     |     |

資料來源：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華僑文化經濟協會1(1947年名簿)」·〈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23·2-3-1。

說明：1. 1947年的〈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名簿〉中因有「曾在」這一人的名字重複出現而將之扣除，因此總計為1,037人。

2. 戰後，依據1945年12月11日公布之「臺灣省縣政府組織規程」，行政區域劃分為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臺南縣、高雄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八個縣轄市。但〈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名簿〉將籍貫分為基隆縣、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彰化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臺東縣、花蓮港縣、澎湖縣十一縣轄市。本表採「臺灣省縣政府組織規程」，將基隆縣併入臺北縣，彰化縣併入臺中縣，嘉義縣併入臺南縣，花蓮港縣改為花蓮縣。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行政篇》(南投：該會，1996)，頁629-636。

表四 1947年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會員人口年齡分析表

| 出生年       | 年齡     | 人數  |
|-----------|--------|-----|
| 1929-1938 | 10-19歲 | 7   |
| 1919-1928 | 20-29歲 | 468 |
| 1909-1918 | 30-39歲 | 289 |
| 1899-1908 | 40-49歲 | 102 |
| 1889-1898 | 50-59歲 | 21  |
| 1879-1888 | 60-69歲 | 7   |
| 不明        | —      | 143 |
| 合計        | 1,037人 |     |

資料來源：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華僑文化經濟協會1(1947年名簿)」·〈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23·2-3-1。

說明：1947年的〈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名簿〉，因有「曾在」這一人的名字重複出現而將之扣除，故總計為1,037人。

表五 1947年神戶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會員職業別分類

| 職業別 | 人數  | 職業別 | 人數 | 職業別 | 人數 | 職業別 | 人數 |
|-----|-----|-----|----|-----|----|-----|----|
| 商業  | 349 | 製造業 | 10 | 自由業 | 16 | 職人  | 19 |
| 工業  | 7   | 服務業 | 93 | 事務職 | 34 | 其他  | 7  |
| 合計  |     |     |    | 535 |    |     |    |

資料來源：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華僑文化經濟協會1(1947年名簿)」·〈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23·2-3-1。

說明：職業分類為筆者分析的結果。

### (三) 文化事業與社會事業

#### 1. 文化事業

前已提及華僑文化經濟協會除以提升華僑文化為宗旨外，也具有發揮同胞互助精神的類同鄉團體性質，因此該協會在文化與社會事業方面皆有其實踐活動。

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將其支持中國的理念與其政治傾向表現在文化事業方面。從其留存的「行事錄」資料來看，可知該協會從 1948-1950 年利用星期六舉辦過 14 回的座談會及 1 次理事會，這段時間正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巨變期。座談會除有華僑談音樂鑑賞與歸國考察談外，較多的是邀請大學講師、教授、中國研究所、神戶商工會議所等日本人士談有關經濟、文化、華僑教育等問題，特別是集中在日本與中國的相關議題上。<sup>83</sup> 由此除了可看出該協會對中國問題的關注，或許也可將這視為該協會的祖國意識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提示。

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所推展的另一項文化事業，為利用臺灣省民會時期的剩餘資金辦理機關誌月刊《華僑文化》。該月刊從 1948 年 12 月 22 日創刊到 1954 年 6 月 1 日的第 58 號之後，為專心協助辦理華僑集體歸國及遺骨送還事業而停刊。其內容涵蓋對華僑的知識啟蒙、維護生活權益、並擔負起與華僑團體間聯絡的角色，但也能看出其支持中國共產黨、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臺灣統治、反對臺灣獨立運動的傾向。

《華僑文化》為神戶臺籍華僑的代表性刊物，由華僑青年知識分子負責編輯，其主要目的如會長陳義方在創刊詞中提到的一段「……要求世界各國將來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先將提高我們文化。」<sup>84</sup> 是以《華僑文化》在藉由讀者投稿及訊息傳達，來作為提供讀者交換意見、華僑對話及省思的場合。不過實際上該份刊物從創刊開始，除了傳達駐日代表團的通告外，幾乎很少有關中華民國政府方面的訊息，也少有支持中華民國方面的報導與投稿。反之其內容多在報導中國大陸的近況，與支持共產黨政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言論。可知《華僑文化》從創刊後，其一貫立場在期待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即將成立的新民主主義國

<sup>83</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華僑文化經濟協會 7 (行事錄)」，〈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29・2-3-7。

<sup>84</sup> 陳義方，〈創刊詞〉，《華僑文化》1 (1948 年 12 月 22 日)，頁 1。



家。特別是在 1949 年 10 月第 11 號，發表了一篇〈民主集中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向華僑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sup>85</sup> 接著隔年 10 月 1 日的第 23 號封面上刊出毛澤東頭像素描，<sup>86</sup> 此後各號封面也多為介紹當前中國大陸實態及中國庶民、農工商人、解放軍等活動的木刻版畫與素描。雖說由臺籍華僑組成的文化經濟協會也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聯絡，但同時也扮演了神戶華僑總會與親中國的神戶華僑團體間的仲介橋樑。不過北京政府建立後的《華僑文化》在刊登內容上，已完全是中國政府方面的報導，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不言而喻。

## 2. 社會事業

戰後協助華僑順利返國與因戰爭犧牲性命同胞遺體的送還，為神戶華僑團體的重要社會事業之一，其中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戰中隨日本軍隊遠征海外而犧牲的臺籍戰歿者遺骨，除戰爭中有由各相關政府機關保管外，在戰後由日本陸海軍復員部隊帶回；屬於陸軍部隊的由福岡地方世話部（local assistance office）保管，海軍部隊方面則由佐世保地方復員部負責保管與送還事務。1951 年 3 月 5 日在駐日盟軍總部的指令下，在停泊神戶的輪船上，將臺籍戰歿者遺骨 648 柱交予駐日代表團。<sup>87</sup> 接著在 3 月 11 日，由神戶華僑總會、遺族代表、大阪華僑總會、國民黨神戶支部、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中華會館、華僑福利合作社、華僑製菓協會、華僑麵麩協同組合等代表，於關帝廟舉行臺籍戰歿者慰靈祭後，中華民國政府所屬船隻「鐵橋輪（テイエチアオ號）」於 12 日由神戶港出發，將遺骨送還臺灣。<sup>88</sup> 由於臺籍戰歿者係屬日本帝國軍人軍屬身分，日本政府遵照 GHQ 禁令停止一切對戰亡者的祭祀活動，同理駐日代表團

<sup>85</sup> 〈民主集中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華僑文化》11（1949 年 10 月 10 日），頁 10-11。

<sup>86</sup> 《華僑文化》23（1950 年 10 月 1 日），頁 1。

<sup>87</sup> 《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記載遺骨 674 柱，但《華僑文化》第 29 號記載 648 柱，本文採用後者。參見厚生省援護局編，《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頁 77-78；〈臺灣出身戰爭犧牲者遺灰路過神戶歸國〉，《華僑文化》29（1951 年 4 月 1 日），頁 12。

<sup>88</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遺骨送還事業（花岡事件）1」，〈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44・8-0-2；厚生省援護局編，《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頁 77-78；〈臺灣出身戰爭犧牲者遺灰路過神戶歸國〉，《華僑文化》29（1951 年 4 月 1 日），頁 12。

應也以此態度看待，因此推測此次慰靈祭應由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統籌辦理。<sup>89</sup>

1950年代國共對立下，中華民國政府反對華僑與中國大陸方面的聯絡，接受其指導的神戶華僑總會對1953年展開的華僑集體歸國（中國大陸，以下省略），和遺骨送還運動有關的社會事業顯得消極，此時可說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在前次既有的基礎上，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

日本華僑得以實現歸國的願望，始於前面所述從1953年重開送返在中國的日僑歸國之路。要注意的是，除了華僑歸國願望得以實現外，這一年正是北京政府實行第一個五年經濟計畫開始之際，因此大力呼籲華僑青年回國參與「祖國」建設，獲得熱烈迴響，而在1953年形成一股很大的熱潮。另外，從希望歸國者動機來看，除了華僑歸國與響應參加回國建設者外，華僑的外國人身分，使許多人無論在求職、住宅資金的利用等方面無法適用日本法律，以致生活陷於困難。<sup>90</sup>是以在希望歸國者中，除了上述志願歸國者外，也包含犯罪和生活陷入困境的華僑。因此為謀求改善生活現況而選擇橫渡大陸，這類華僑的因素也必須考慮在內。

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資料室所藏「帰国事業」，主要為1953年的歸國事業關係資料。由資料來看，可知由於期待歸國華僑的人數眾多，使得相關的準備事項非常繁雜。此時期，處理華僑集體歸國事務的聯絡總部設於中共系的東京華僑總會，再於各地設立支援機關。在關西地區，大阪設有關西華僑歸國世話委員會；在神戶，主要由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中華青年會以及中國留日神戶同學會（以下簡稱「神戶同學會」）〔按：神戶歸國三團體〕組成歸國委員會外，另設有關西貧困華僑歸國世話委員會。<sup>91</sup>至7月8日根據〈華僑歸國者大會決議〉，神戶歸國三團體向神戶華僑總會請求支援。接受請求的華僑總會則設立神戶華僑總會會員離日援助委員會，以臺籍華僑陳通為會長進行募款活動，舉辦華僑歸國歡送會等事宜。

接著，為使事業順利進行，召開多次歸國事業會議。會議中討論了包含歸國華僑問題、關於中國人犯罪者歸國之件、歸國華僑乘船代表等問題。歸國委員會

<sup>89</sup> 義方，〈臺灣省出身青年戰沒者有罪嗎？〉，《華僑文化》29（1951年4月1日），頁2。

<sup>90</sup> 〈殆んどが生活困窮者〉，《國際新聞》，1953年4月28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sup>91</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帰国事業」，〈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48・8-0-2。

每回必須選出東京華僑總會、關東地區與關西地區各一名歸國華僑乘船代表，協助處理歸國事務與乘船途中的事務。另外，也召開希望歸國者懇談會，並從中選出團長、副團長、事務局（書記）、班長及行動隊長。希望歸國者與另設置的學生 1 班，共設有 8 個班。最後在一切手續備妥後發給歸國者〈歸國證明書〉。

此外歸國委員會也將歸國的相關資訊，如現金、日常用品的準備、注意事項和對學習國語的建議等編輯成〈歸國華僑須知（帰国華僑のこころえ）〉，分發給歸國華僑，並舉辦歡送會和最後到車站送行。之後並將歸國華僑的歸國情形傳達給神戶華僑，如神戶歸國事業三團體發行〈歸國者新聞（帰国者ニュース）〉、在中華青年會舉行歸國代表報告會，會中陳義方與黃鴻記分別以福建話和廣東話，向神戶華僑報告華僑歸國狀況。<sup>92</sup>

華僑集體歸國自 1953 年 6 月 27 日開始，首次華僑歸國者在舞鶴搭乘興安丸出發前往「祖國」中國，至 1958 年 6 月 29 日總計輸送 14 次，3,754 人達成宿願。<sup>93</sup> 在這段期間中，總計歸國華僑人數約佔當時在日華僑總數的十分之一，而其中約有三分之二為臺灣人。又，據說在神戶的臺籍華僑從 1953 年到 1959 年，約有 700 人渡航到中國。<sup>94</sup> 而從上列表一來看，戰後到 1950 年代末在神戶的臺籍華僑有 3,000 多人，人數可謂眾多。再者，根據當時傳達回國盛況的《國際新聞》報導指出，<sup>95</sup> 當時的臺灣社會不僅充斥著失業者，且回臺須繳交巨額的入臺保證金等原因，這應也成為臺籍華僑返回臺灣的阻礙之一。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卻傳達了對準備歸國的臺灣省民將與中國出身者享有同等待遇，並已做好接待華僑的準備等訊息。<sup>96</sup> 由此來看，戰後不安定的狀況中，由於北京政府對臺籍華僑的重視，使

<sup>92</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帰国事業」，〈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48・8-0-2。

<sup>93</sup>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頁 252。

<sup>94</sup> 此處中華會館編的《落地生根》一書中，記載 1953 年到 1959 年間返國的約 700 人是神戶華僑，此與本田善彦，《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指出的是臺籍華僑有所不同。不過對照外交部檔案中指出，1953 年歸國華僑中大陸籍僅 400 餘名，而臺灣籍反在 2,000 名以上。因此本文採本田善彦的說法。參考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頁 252；本田善彦，《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6），頁 20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對在日匪共活動管見（亞太司收文第 8137 號 民國 45 年 5 月 25 日）」，〈匪共在日活動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05.21/0024。

<sup>95</sup> 〈消極的な吉田政府、國府より“黒幕”へ遠慮？〉，《國際新聞》，1953 年 5 月 23 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sup>96</sup> 〈消極的な吉田政府、國府より“黒幕”へ遠慮？〉，《國際新聞》，1953 年 5 月 23 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得對日本與臺灣皆無法依賴的部分日本臺籍華僑，轉為對社會主義中國寄予期待。

同時，戰爭中因「強制連行」受虐死亡的中國人勞動者遺骨，散布在日本全國各地。1949年秋天，由民促會展開秋田縣花岡的中國人俘虜殉難者遺骨調查後，隔年1月在其機關誌《華僑民報》中報導，11月在淺草東本願寺舉行「花岡殉難四百十六烈士追悼會」。<sup>97</sup>至1953年2月，以日本紅十字會、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平和聯絡委員會為中心，結合其他日本民間團體、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與中國留日同學總會，組成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進一步擴大在各地的遺骨調查、舉行慰靈祭和中國殉難者遺骨送還事業。<sup>98</sup>

由於第一次中國人俘虜殉難者遺骨送還由神戶港出發，因此神戶華僑團體必須進行各種準備。神戶歸國三團體在中華青年會召開華僑各界懇談會，選出神戶遺骨捧持代表的臺籍華僑林水永。同時另外又組織中國人俘虜殉難者遺靈奉送神戶實行委員會，委員長為陳義方、副委員長為日本人西村四郎。<sup>99</sup>1953年7月2日，在該實行委員會主辦下，於神戶關帝廟進行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祭，由遺骨捧持團搭乘黑潮丸由神戶港出發送還中國。第2回以後遺骨捧持團則與歸國華僑一起進行，主要利用興安丸回中國。

## 四、左傾的神戶華僑團體與其活動

### (一) 主要華僑青年團體與其活動

如前所述，戰後隨即組成的青年團體是中華青年會，初任總幹事為陳德仁。<sup>100</sup>

<sup>97</sup> 中國人殉難者名簿共同作成實行委員會編，《中國人殉難者遺骨送還狀況——第一次～第八次：ポツダム宣言受諾と強制連行事件》（東京：中國人殉難者名簿共同作成實行委員會，1960），中國人強制連行事件に関する報告書：第2篇，頁75；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340-345。

<sup>98</sup> 中國人殉難者名簿共同作成實行委員會編，《中國人殉難者遺骨送還狀況——第一次～第八次：ポツダム宣言諾と強制連行事件》，頁92-94。

<sup>99</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遺骨送還事業（花岡事件）1」，〈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44・8-0-2。

<sup>100</sup> 陳德仁（1917-1998），神戶華商。原籍廣東省南海人，出生於神戶。1944年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學校中國語科，曾任該校講師及大阪每日新聞（中文）工作。參與二次大戰後神戶中華青年會及神戶華僑總會的成立。1948年設立中美商行。1958年為神戶中華學校校舍重建而奔走，而任該校理事長。其後擔任神戶中華總商會會長、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館長、兵庫縣廣東同鄉會顧問等職，對神戶華僑社會貢獻良多。參見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522、523。

該會的成立如會章第一章第二條（1953年9月20日修改通過）所定：「本會以發揚中華文化，砥勵僑胞青年德智體群之向上，及謀求僑胞為福利」作為主要目的。<sup>101</sup>因此青年會除設立各種文化、體育等部門推動華僑青年活動外，其在華僑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值得注目。

根據陳德仁回憶，青年會初成立時僅約有50名會員，但隨即參與戰後各項華僑復興工作，包括促成神戶華僑總會的成立而與之結成緊密關係，之後在每年的神戶華僑總會選舉理事時發揮重要影響力，不數年之間即擴展為具有4、5百人規模的團體。<sup>102</sup>又在陳德仁等人奔走下，成立了在神戶市內中山手通2丁目的中華青年會館的第一會所，和以清末寧波華僑巨商吳錦堂的舞子別莊「移情閣」為第二會所的兩處場所，不僅提供了青年會的集會場所，亦是神戶華僑進行各項集會時的重要場所。<sup>103</sup>

而隨著會員增加及規模的擴大，青年會與華僑信仰中心的關帝廟也相繼投入華僑幼兒教育事業。先有青年會在1950年4月，以第一會所體育館的部分用地來開設幼稚園。接著隔年2月，在關帝廟也由其住持湯欽明（釋仁光）附設了光華幼稚園。不久，由於兩所幼稚園都有感於場所擁擠與設備的不健全，認為有合併的必要，而在高砂商行社長李義招<sup>104</sup>的構想下獲得陳德仁協助，在1952年6月17日締結了中華青年會附屬幼稚園與光華幼稚園的合辦契約，隨後在7月1日正式合併為神戶華僑幼稚園，並推黃潛園為園長，王淑珠為副園長。<sup>105</sup>接著神戶華僑幼稚園又獲得華僑的捐款，在1953年購入山本通3丁目一處洋館並擴充設備，

<sup>101</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1：神戶中華青年會會章（1953年9月20日修改起草通過）」，〈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No.14・1-7-1。

<sup>102</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回憶二〇年〉」，〈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03</sup> 陳來幸，〈陳德仁：日中文化交流の橋渡し〉，收於神戶華僑華人研究会編，《神戶と華僑：この150の歩み》（神戶：神戶新聞総合出版センター，2004），頁103-104。

<sup>104</sup> 李義招（1907-？），臺灣臺中梧棲人。1926年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其後至神戶創辦高砂製帽商行，經營臺灣帽子及原料的輸移出。二次大戰後，協助成立神戶華僑幼稚園及設立董事會，並任董事長，其後董事會改組為理事會，為首任理事長。參見台灣新民報社編集，《台灣人名辭典》，頁403；學校法人神戶華僑幼稚園編，《學校法人神戶華僑幼稚園五十周年紀念刊》（神戶：該園，2001），頁19；陳來幸，〈陳德仁：日中文化交流の橋渡し〉，頁104。

<sup>105</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中華青年（神戶中華青年會第七屆幹事會，1952年7月20日）：本會附屬幼稚園報告、華僑幼稚園合辦合同，頁2-5」，〈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戶No.7・11-2-7；學校法人神戶華僑幼稚園編，《學校法人神戶華僑幼稚園五十周年紀念刊》，頁19。

而在 1954 年取得準學校法人資格，完善了幼稚園的規模。<sup>106</sup> 由以上來看，戰後的中華青年會因實際投入各項華僑活動，成為對華僑社會有影響力的中堅力量。

而繼中華青年會之後，第二個成立的華僑青年團體是在 1946 年組成的神戶同學會。只是雖名為「留日」同學會，但神戶並非留學主要重地，因此該會實則由當地華僑子弟組成。其運營方式由 1947 年 8 月的資料可略見概況，即神戶同學會將 40 多名會員分為 4 組，再由各組向總務、聯絡、福利各部推出幹事一名後，從幹事中選出總幹事與副總幹事各一名。而會務則是由各組輪流負責。<sup>107</sup> 可見，神戶同學會儘管規模小，但仍有具體的規畫，注重組織的運作。

與上述兩個青年團體比較，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校友會（以下簡稱「校友會」）的組成較遲。1947 年 8 月 24 日，由戰後復校的畢業生周曙光、徐仕興、易廣洪等發起召開第一屆全體會員大會，正式成立校友會，推選易乃成擔任總幹事。<sup>108</sup> 校友會設立的目的如章程第 1 章第 2 條規定：「本會以連絡同學們感情之交歡，在外之協助及共同團結為母校貢獻為宗旨。」<sup>109</sup> 因此畢業生即為當然會員。校友會最初在全體會員大會之下設總幹事與副總幹事，並設置總務部、文化部。<sup>110</sup> 接著隔年 7 月 19 日，周曙光等人又組織了東京分會，而校友會在此前後又分別設立了音樂部、籃球部、桌球部、美術部、讀書研究部、婦女部與扶學、就職兩委員會等，使其組織規模更完備。<sup>111</sup> 而校友會與青年會和神戶同學會同樣的也以旅行、體育競賽、音樂會、電影放映、演劇等進行親睦活動。另外，從召開的懇談會中可看出關心母校經營與學生就職的問題。<sup>112</sup>

以上為三個青年團體設立過程的梗概，至於其政治傾向，則可由各活動間之關連和其機關誌來討論。前已提及，最早設立的中華青年會，可說是推動各項神戶華僑青年活動的基礎，而參加各個青年團體的成員實際上相互重疊。這裏以

<sup>106</sup> 陳來幸，〈陳德仁：日中文化交流の橋渡し〉，頁 104。

<sup>107</sup> 〈關西各同學會めぐり 大金持の息子でも、夏休中は働く〉，《中華留日學生報》9（1947 年 8 月 15 日），第 3 版。

<sup>108</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同文學校々友會章程」，〈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2-1-10。

<sup>109</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同文學校々友會章程」，〈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2-1-10。

<sup>110</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11</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12</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1953年10月中華青年會第9回幹事會幹事選舉的結果為例。此次選舉，分別選出總幹事藍璞，副總幹事劉潤堯與陳天壽，常務幹事麥壽，幹事甘亦雅、王淑珠、鄭玉琮、陳學忠、蔡宗傑、鄭孝舜、施兆昌、姜勤生、趙啟泰、黃紹年、潘來喜。<sup>113</sup>從相關資料的比對，在這些幹部或其他團體青年中，可知鄭孝舜在1946年代表參加了中華民國留日同學總會的準備會議。<sup>114</sup>附帶一提的是，1947年當時擔任神戶同學會主席的尹維業，為在1949年4月時華僑新民主協會神戶分會的設立而奔走。<sup>115</sup>陳學忠則在1959年左右擔任旅日華僑青年聯誼會本部事務局長。<sup>116</sup>甘亦雅與王淑珠則曾分任神戶華僑幼稚園第二任園長與第一任副園長。以上，他們分別代表了神戶青年知識分子對政治與社會的關懷，活躍於各領域。並且，這些青年強烈感受到對華僑社會啟蒙的必要性，傾注熱情編集各種會報與機關誌。例如神戶同學會的陳仰臣不僅任該會的總幹事，同時期也為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機關誌《華僑文化》的總編輯。<sup>117</sup>而1949年同文學校校友會機關誌《校友會報》創刊之際，趙啟泰擔任了編輯。<sup>118</sup>由此來看，在北京政府即將建立的前夕，華僑青年團體已形成支持新中國的人際網絡；在建立後，這些團體明確打出支持新中國旗幟，招待訪日中國代表團，並積極進行華僑集體歸國與遺骨送還等社會事業，也與其他華僑團體間建立起緊密的關係。

另外，這三個華僑青年團體支持北京政權的態度，由其發行的刊物也能明顯看出。首先，在中華青年會方面，可從1948年《神戶中華青年會三週年紀念專刊》，<sup>119</sup>1955年《神戶中華青年會拾週年紀念專刊》<sup>120</sup>和1965年《青年—神戶

<sup>113</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14</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59。

<sup>115</sup> 〈在神華僑の動向：華僑を逆遇する日本政府：講和条約締結後の貿易に期待〉，《神戶經濟新聞》，1949年3月1日，頁7。

<sup>116</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報》」，〈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戶 No.4・11-2-4。

<sup>117</sup> 〈國際學生協議會に加入、神戶同学会幹事改選さる〉，《中國留日學生報》26（1949年2月1日），第3版。

<sup>118</sup> 〈本報分配網（1949年）〉，收於陳來幸編，《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校友會報」第一號（1949年）～1971年1月25日號（1971年）》（阪神華僑の國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資料3，神戶：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2004），第1號（1949年），頁8。

<sup>119</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青年》神戶中華青年會（1964年-1969年）（附：三週年紀念專刊、拾週年紀念專刊、二拾週年紀念專刊）：楊秩華編，《神戶中華青年會三週年紀念專刊》（1948年9月3日）」，〈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戶 No.6・11-2-6。

中華青年會二拾週年紀念專刊》<sup>121</sup> 這三個時期的紀念專刊來做比較。由三週年紀念專刊來看，同時擔任青年會總幹事及國民黨神戶直屬支部宣傳部主任陳宇翔，與駐日代表團神阪分處主任劉增華，兩人在紀念刊上發表對青年與國家的看法，勉勵青年對國家做出貢獻外，其他則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體育、詩詞、幹部的介紹等，立場中立。說明中華青年會由創立到 1948 年為止，是接受駐日代表團的指導。然而在拾週年紀念專刊上，陳德勝在〈回憶十週年紀念（拾週年紀念に憶う）〉中強調青年會並非「赤色」團體，也不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活動的據點，而是在追尋真理，從事正確的活動。又至二拾週年紀念專刊，其內容已完全是以新中國為中心的報導與介紹。由這三份紀念專刊，明顯反映中華青年會政治傾向的轉變。

其次，中國留日同學會機關誌方面，依時期有《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中華留日學生報》、《中國留日學生報》的名稱轉換。同學會編輯的會報，可說是青年團體發行會報中，無論在內容與編輯技術等方面，堪稱具水準的刊物。其機關誌的內容從會務訊息到文化活動、華僑社會動態、國際情勢等皆有涉及外，也能看到對二二八事件的關心與反對臺灣獨立運動的言論。到了 1948 年民促會與民中研設立以後，可以看到傾向中國的態度明顯。例如同學會在 1949 年協助民促會、民中研舉辦二二八紀念大會外，<sup>122</sup> 同年北京政府成立之時，在 10 月 1 日的第 36 號刊物中，以全版面介紹新中國的成立，<sup>123</sup> 充分表明了同學會的政治立場。

除此以外，同學總會在各地的同學會支部也分別辦理會報會務。1946 年時創辦的有留日東京同學會第 2 部的《白日旗》，大阪同學會的《白蘭》，京都同學會的《崑山》及北九州同學會的《牡丹》。接著在 1947 年有神戶同學會《星火》與中華留日一高同學會《橄欖》。<sup>124</sup> 雖無法確定是否所有同學會都出版會報，但像

<sup>120</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青年》神戶中華青年會（1964 年-1969 年）（附：三週年紀念專刊、拾週年紀念專刊、二拾週年紀念專刊）：楊秩華編，《神戶中華青年會三週年紀念專刊》（1948 年 9 月 3 日）」，〈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戶 No.6・11-2-6。

<sup>121</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青年》神戶中華青年會（1964 年-1969 年）（附：三週年紀念專刊、拾週年紀念專刊、二拾週年紀念專刊）：楊秩華編，《神戶中華青年會三週年紀念專刊》（1948 年 9 月 3 日）」，〈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戶 No.6・11-2-6。

<sup>122</sup> 〈「陳儀を戦犯に倒れし先烈に續け」台灣二・二八事件記念大会〉，《中國留日學生報》26（1949 年 3 月 15 日），第 2-3 版。

<sup>123</sup> 《中國留日學生報》36（1949 年 10 月 11 日），第 1-3 版。

<sup>124</sup> 陳萼芳，〈在日本華僑言論出版界的現狀〉，《中國公論》創刊號（1948 年 6 月），頁 19。



神戶同學會初成立時僅有 40 餘人這樣的規模，因經費拮据僅能以手寫油印形式發行《星火》。但該份刊物從 1947 年 1 月創刊到現存資料的 1958 年 1 月的第 60 號，持續十年的編輯發行可看出對維持這個團體的熱情。

《星火》登載的內容除會務與文藝創作外，採取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場。例如從 1952 年 8 月發生在橫濱中華學校的政治對立糾紛，及批判同年在臺北召開的「全球僑務會議」或回顧二二八事件來看，都是採與國民黨政府對立的態度。<sup>125</sup>

另外，校友會機關誌《校友會刊》，創刊於 1949 年 8 月 20 日，<sup>126</sup> 是為組織萬全與企劃能力優秀的月刊，對戰後校友會活動做了詳細記錄。《校友會刊》重視青年的知識啟蒙，從有關華僑權益、婚姻、就職、華僑自覺、文化提升到歷史、科學、美術、音樂等方面的議論都盡可能收錄刊載。當然對青年學生而言，對時事和國際局勢的關心是不可欠缺的，在《校友會刊》中也對揭舉民主統一戰線的新中國寄予期待。同樣地，也批判臺灣獨立運動，並視美國為帝國主義國家，而將臺灣獨立運動的對美國請願行動，冠以帝國主義的「走狗」等激烈辭彙來予以批判。<sup>127</sup>

在此必須提出的是，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傾向，是因為戰後復校不久後，學校即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之故。根據林麗韞<sup>128</sup> 的同文學校求學回憶，當時她是在有著宛如家庭般溫暖的氛圍中學習中國歷史，培養了中華

<sup>125</sup> 〈暴力!!鮮血!!の始業式〉、〈在日の全同胞に訴える〉、《星火》45 (1952 年 9 月 17 日)，頁 3-4、6；〈台北會議に関する京浜地方の動き〉、《星火》48/49 (1953 年 1 月 15 日)，頁 4-5；〈二二八民變是怎样發生的呢？〉、《星火》50 (1953 年 2 月 28 日)，頁 6-7。以上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星火》、中国留日神戸同学生会 (1951 年-1958 年)」，〈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雜誌・神戸 No.5・11-2-5。

<sup>126</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戸中華青年会」，〈陳徳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27</sup> 〈何謂「台湾獨立運動」？〉，收於陳來幸編，《神戸中華同文学校：「校友会報」第一号（1949 年）～1971 年 1 月 25 日号（1971 年）》，第 8 號（1950 年 4 月 20 日），頁 1。

<sup>128</sup> 林麗韞 (1933-)，臺灣臺中清水人。因父親不滿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遂於林麗韞公學校 2 年級時全家移住神戶，並進入神戶中華同文學校就讀。父親林水永是衣料品批發商，戰後很快的即支持中國的新政權，前後歷任神戶華僑總會理事、華僑文化經濟協會理事、華僑新民主協會神戶分會副委員長、日本華僑貿易公會常務理事、關西華僑協商會議代表、華僑聯誼會副會長等。由此可推測林麗韞應受到父親影響，而憧憬新中國，1952 年渡大陸進入北京大學。由於具臺籍身分且精通日語，林受到北京政府重視，不久被分配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聯絡部，主要負責對日工作。1972 年中日國交「正常化」之際，亦擔任中國首腦的日語翻譯工作。此外，前後還擔任中華全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等重要職務。參見本田善彦《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頁 1-64、151-283；許瓊丰，〈戰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頁 180、188、196。

民族的認同，特別是受到校長李萬之<sup>129</sup> 與主任李蔭軒很大的影響。同時，由老師們在學校主持的讀書會也宣傳社會主義思想。<sup>130</sup> 可想而知，當時社會主義思想應在學校裏蔚為一股風氣，並在青年學生間流行。而同文學校是戰後日本規模最大的華僑學校，其對學生和青年間與關西地區華僑社會產生的影響不能忽視。因此 1953 年開始的華僑集體歸國的熱潮中，即獲許多校友的響應，集體返回中國參與國家建設。<sup>131</sup> 其後到了 1957 年，同文學校開始進行在空襲中被毀壞的校舍重建之際，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同文學校左傾嚴重，而欲利用此一機會來進行改組，因而與學校和校友會發生了嚴重的對立。最後結果雖由支持校舍自主重建的華僑集體出資完成而暫告一段落，但對國民黨政府以政治力介入神戶華僑社會所帶來的後續影響，日後有必要進一步考察。<sup>132</sup>

## （二）從左傾到與北京政府建立起正式管道的華僑團體

如同前述，二二八事件後以東京的民促會為中心，進行支持中國共產黨活動，並受到其他地區華僑社會響應。在大阪，先設立了全關西華僑新民主同盟，隨後又改組改名為華僑新民主協會，在 1949 年 3 月 11 日組織了京部分會，神戶分會則於 4 月 2 日在台神洋行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委員長林火生（臺灣新竹人、台神洋行社長）、副委員長林水永。<sup>133</sup> 於是，就這樣到了 9 月 21 日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其訊息也能即刻傳達給日本華僑。同時由民促會與民中研帶頭呼籲各華僑團體支持新中國外，留日華僑總會、東京華僑聯合會及東京同學會經過討論，決定在 10 月 10 日雙十節慶祝會中兼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決議。<sup>134</sup> 接著，

<sup>129</sup> 李萬之（1914-2000），河北省人。河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後，1935 年渡日，任神阪中華公學教師。1943-1982 年任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校長，之後任名譽校長。1946-1948 年、1976-1986 年任中共系神戶華僑總會會長，之後任名譽會長。1984 年獲兵庫縣國際文化賞、及勳五等雙光旭日章。參見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 819-820。

<sup>130</sup> 本田善彦，《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頁 1-64、151-283。

<sup>131</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陳徳仁コレクション〉，1-7-1。

<sup>132</sup> 許瓊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の華僑政策と神戶中華同文学校の再建〉，頁 63-80。

<sup>133</sup> 〈僑界消息〉，《華僑文化》4（1949 年 3 月 21 日），頁 8；〈華僑新民主協會神戶分會發會式〉，《華僑文化》5（1949 年 4 月 21 日），頁 6；〈在神華僑の動向：華僑を逆遇する日本政府：講和条約締結後の貿易に期待〉，《神戶經濟新聞》，1949 年 3 月 1 日，頁 7；〈華僑と財産取得令：共存共榮の中日關係の諸問題〉，《神戶經濟新聞》，1949 年 5 月 1 日，頁 14。

<sup>134</sup> 〈各界あけて支持／十月十日双十節に祝賀會〉，《華僑民報》8（1949 年 10 月 11 日），第 2 版。

由於新中國的成立，華僑新民主協會神戶分會又再度改組為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神戶分會，委員長仍由林火生擔任。<sup>135</sup> 由以上的變遷來看，很明顯的日本華僑社會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態勢是以二二八事件為開端，促使民促會成立並帶動各地華僑社會響應。而隨著新中國成立，民促會進一步統合各地華僑勢力，加強了與國民黨政權對立的勢力，此由前述的 1951 年東京華僑總會的分裂即能說明。另外須留意的是，從其領導人物來看，無論是民促會或神戶新民主協會都是以臺灣人為中心組成，更且在北京政府成立時，已由中華民國政府指導下的僑會公開表態支持，可說這是中華民國政府在日本華僑社會的最大領導危機。

然而由於北京政府成立後隨即參與韓戰，因此遲至 1954 年 9 月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制定憲法。北京政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前一年 11 月，召開集合了世界各地華僑代表的僑務擴大會議。由於適逢華僑集體歸國與遺骨送還運動的最高潮，因此參與此次會議的日本華僑代表包括協助華僑歸國的乘船代表及遺骨捧持代表在內多達 36 名。而參與的華僑代表在返回日本後即依據會議決議的「海外華僑當面的任務」，展開召開全國組織性的留日華僑協商會議（以下「華僑協商會議」）的籌備。<sup>136</sup>

1954 年 1 月 15、16 日召開的華僑協商會議籌備會，是首次遵循北京政府的指導方針，集合了日本各地 240 餘名代表的會議。會議中推舉呂漱石（東京地區代表）、林炳松（大阪地區代表）、陳義方（神戶地區代表）3 名臺籍華僑，以及籍貫不明的余東照（橫濱地區代表）、林義春（九州地區代表）與呂永和（中共系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代表）6 名為主席團；另外也是臺籍華僑陳焜旺為事務局長。<sup>137</sup> 主要討論的議題除有關日本華僑問題外，也討論了歡迎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問題，並選出參加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楊春松、甘文芳、康鳴球、劉明電的 4 名代表人選，以交由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做最後決定。<sup>138</sup> 從此次會議來看，由擔任會議主席團代表到選出參加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選，幾全為臺籍華僑。可說這次會議除

<sup>135</sup> 〈留日華僑民主促進會神戶分會通告〉，《華僑文化》18（1950 年 5 月 1 日），頁 8。

<sup>136</sup> 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298-299、301-303。

<sup>137</sup> 〈留日華僑協商會議閉幕〉，《華僑文化》56（1954 年 1 月 25 日），頁 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偽『旅日華僑代表協商會議』調查報告表（亞東司收文第 466 號，中華民國 43 年 2 月 17 日收到）」，〈日本僑務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61/0008。

<sup>138</sup> 〈人民代表に四名の候補〉，《中國留日學生報》（1954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顯示臺灣人在華僑社會的位置外，更重要的應是突顯了北京政府對在日臺籍華僑的重視。

而在上述會議達成結論的基礎下，各地很快地展開華僑協商會議籌備會。為統合關西地區各地方的協商會議，組成關西華僑協商會議。神戶至 7 月也開始動員，召開了神戶華僑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同時並著手討論邀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訪問神戶一事。<sup>139</sup>

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後，華僑協商會議於 1954 年 11 月 2 日，集合東京、北海道、岩手、宮城、德島、茨木、長野、群馬、埼玉、山梨、橫濱、愛知、靜岡、京都、大阪、神戶、四國、山口、九州及中國同學總會等各地代表，在東京藏前工業會館正式成立。在當日成立大會上，先有康鳴球做代表日本華僑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外，之後是參加會議全體代表與正在日本進行訪問的中國紅十字代表團一起，參加在淺草本願寺舉行的中國人俘虜殉難者全國合同慰靈祭，最後根據〈留日華僑協商會議規約〉選出各地代表組成議長團，開始正式運作會務。<sup>140</sup>

從以上的成立過程來看，華僑協商會議的成立，代表北京政府在日本華僑社會建立了正式聯絡機關的開始。而在這段時間中，北京政府在日本巧妙地將中國、日本社會與華僑聯結起來，使日本社會瀰漫一股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氣氛，也吸引了部分持觀望態度的華僑，並成功推進了對日本的和平攻勢。<sup>141</sup>

在這樣的基礎下，到了 1957 年左右，在各地陸續設立了華僑聯誼會與華僑青年聯誼會。在本文中，對其設立的背景與北京政府的關係雖然尚未能清楚釐清，但可視為是日本華僑社會為支持北京政府，而進一步組成的橫向組織系統。以神戶為例，神戶華僑聯誼會是在 1957 年 2 月 9 日，由 40 多位華僑在神戶纖維會館成立，並選出會長陳義方，副會長林水永、蔡振耀、蔡送來、陳桓華，監察委員林清木、陳通、莊傳淵。事務所則暫設於神戶華僑信用金庫 3 樓的華僑文化

<sup>139</sup> 〈僑界ニュース〉，《僑聲》2（1954 年 8 月 1 日），頁 3；〈中国紅十字会代表李德全女史を神戸えお迎えしましょう〉，《僑聲》5（1954 年 9 月 15 日），頁 2，收於陳來幸編，《華僑關係新聞雜誌資料：陳德勝文書》（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資料 8，神戸：神戸大学国際文化学部，2005）。

<sup>140</sup> 〈留日華僑協商會議成立〉、〈留日協商會議規約〉，《僑聲》8/9（1954 年 11 月 1、15 日），頁 2，收於陳來幸編，《華僑關係新聞雜誌資料：陳德勝文書》。

<sup>141</sup>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編，《中共分析》，頁 102-103。

經濟協會內。<sup>142</sup> 值得注意的是，從幹部名單中除可看到有多人是已在本文中出現過的臺籍華僑外，也與《落地生根》一書中指出加入聯誼會的會員有半數以上是臺籍華僑的陳述相符合。<sup>143</sup> 再者，在〈神戶中華青年會 1 (1-7-1)〉文書中也記載：

……戰後隨即由華僑中的知識份子階層組織的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同學會等活動的中心是臺灣省出身者；在〔按：華僑〕集體歸國之際在這些組織方面擔任積極的角色，不久即組織聯誼會、華僑貿易商工會的基礎……。<sup>144</sup>  
（筆者譯）

如此，從這些討論來看戰後神戶華僑社會的發展，更能印證臺籍華僑在神戶華僑社會中，扮演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活動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進一步來看華僑聯誼會的工作，其主要任務之一在爭取華僑對「祖國（北京政府）」的向心力。因此神戶華僑聯誼會每年除舉辦象徵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政府獨裁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外，也集合支持北京政府的華僑團體，舉辦國慶節及新年祝賀會等慶祝活動、以及接待中國訪日代表團，或以放映中國電影、舉辦中國展覽會、聯歡會等來爭取華僑。<sup>145</sup> 此外，神戶華僑聯誼會實際上可說是擔負了與神戶華僑總會同樣職務的事務機關。在成立後，不僅繼承了華僑文化經濟協會主導的華僑集體歸國事務，也由於中日兩方關係逐漸加強，1957年在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與日本紅十字會的協助下，華僑得以取得三個月期間的旅行證明書，返回中國探親。<sup>146</sup> 而由於第一梯次 5 名華僑的歸國探親在 5 月 1 日從神戶港出發，在神戶華僑聯誼會的主持下集合了親中國的神戶華僑團體舉辦歡送會。<sup>147</sup> 很明顯，這樣的發展說明了此時日本華僑社會實已存在兩個僑社的事實。

<sup>142</sup> 〈神戶華僑聯誼會成立，討論會章決定負責人〉，《大地報》，1957年2月21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sup>143</sup>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頁256。

<sup>144</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 1：台湾省出身者の問題」，〈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14・1-7-1。

<sup>145</sup> 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神戶中華青年會 1」，〈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文書・神戶 No.14・1-7-1。

<sup>146</sup> 〈旅日華僑能回國探親〉，《大地報》，1957年4月18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sup>147</sup> 〈探親華僑由神戶出帆/当地僑胞開會歡送〉，《大地報》，1957年5月9日，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另一方面，華僑青年聯誼會的成立，則始於中國留日同學總會為紀念成立十週年，在 1956 年 5 月成功舉辦「旅日中國青年聯歡節」。由於參與此次聯歡節的青年，彼此達成了加強全日本華僑青年聯絡，以順利在隔年聯歡節中召開全國性大會的共識下，由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校友會代表提案，而決定設立作為「華僑青年全國性聯絡機關」的「旅日華僑青年聯誼會」，並於同學總會內設事務局。<sup>148</sup> 經過準備，如預期的在 1957 年 3 月集合各地的同學會、校友會、青年會等團體，在神戶召開旅日華僑青年聯誼會第一回全國代表者會議，於是各地華僑青年聯誼會陸續誕生。<sup>149</sup> 自華僑協商會議後到華僑聯誼會與華僑青年聯誼會的成立，可說自戰後到 1950 年代末，北京政府與日本華僑社會的聯絡系統已然建立起來，而神戶華僑團體在這方面組織的完整性及其對活動的投入，更可以看出其對北京政府支持的熱度。

## 五、結論

戰後，在日臺灣人加入日本華僑社會與祖國政權分裂的雙重影響下，使得華僑社會的人口結構與組織發生徹底改變。戰前臺灣人以赴日本內地就學學生或商人等身分進出日本，戰爭結束後臺灣人人數不僅躍居中國各省出身華僑人口的第一位，且原以大陸為僑鄉的華僑社會轉為與臺灣產生密切關係，此為日本華僑社會的最大特色之外，也可說是日本統治臺灣所帶來的影響。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處於兩岸政府政權管轄外的華僑社會深受臺灣、中國、日本三方的關係演變而產生變動。從本文討論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與神戶臺灣人的動向來看，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從東亞的冷戰體制來看，日本的對「中」政策最後選擇不完全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採以「政經分離」與北京政府保持聯繫，反映日本在國家利益與

<sup>148</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抄奉有關在日匪共活動情報二份報請鑒核（中華民國 45 年 7 月 12 日發文）」，〈匪共在日活動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05.21/0024。

<sup>149</sup> 〈決定組織華僑青年聯誼會／聯歡晚會情緒熱烈〉，《大地報》，1956 年 5 月 11 日；〈華僑青年聯誼會代表會議／增強各地青年聯系〉，《大地報》，1957 年 3 月 21 日；神戶同會，〈祝創刊／聯誼會を青年團結の場に〉，《青年聯誼報》，1957 年 3 月 15 日。以上收於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藏，「新聞切抜き」，〈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

社會期待的壓力下無法在「兩個中國」間做出「唯一」的選擇。然而這樣的結果對「兩個中國」各自帶來如何的影響呢？中華民國政府雖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卻無法完全有效約束日本的「反共」立場。然而對欲突破外交封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得以「民間」交流方式來展開對日外交攻勢，在長時間下確也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加強了雙方交流。因此比較同時期兩岸的對日政策，在美國支持下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維持住中國政權的「正統」地位，卻不必然取得對日外交的有利地位；但另一方面，隨著北京政府政權逐漸鞏固，中國從 1954 年開始調整對日政策及展開華僑政策，由經貿、文化、人道等交流，成功地聯結了雙方與日本華僑三方關係。雖說 1958 年發生的長崎國旗事件使雙方交流中斷，但在北京政府的「逐漸累積」外交政策中奠下的基礎，在此事件後北京政府由原先接受日本「政經分離」原則轉為主張「政經不可分」的外交態度，說明已逐漸由日本手中取得外交的主導權，將中日關係帶至下一個新階段。

二、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以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為契機開始發生變化，由在東京的臺灣知識分子為中心組成的民促會，凝聚了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青年與華僑，帶動各地組成民主團體對抗國民黨政府。由本文來看，民促會成立後與中共聯絡，並且在東京華僑聯合會內佔有重要地位，在幾次僑會選舉中與國民黨政府逐漸形成對立的態勢，終於在 1951 年正式分裂。此次分裂固然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改組而引發，但同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已成立，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成為華僑與北京政府直接聯絡的管道，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在日本的處境卻日益困難。

從以上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由民促會向華僑社會宣傳社會主義中國；成立後則以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作為北京政府的代辦機構，對內為與日本華僑社會的溝通管道，對外扮演有如日本駐外單位的角色。之後又隨著韓戰結束，北京政府在內政上的逐漸穩定，於是開始系統地整合日本華僑社會，即指導組織日本全國性的華僑協商會議，進一步再組成華僑聯誼會及華僑青年聯誼會。亦即，戰後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建立外交，日本華僑社會接受的是代表中國「正統」政權的中華民國政府指導，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被視為「不合法」。因此對北京政府而言，在主客觀形勢未明朗前，建立有別於日本各地華僑總會的組

織與系統，有助於北京政府對日本華僑社會的掌握與實際工作的推動。不難想像，北京政府在推動與日本建立邦交的同時，也進行收編華僑社會的工作，因此 1954 年是戰後中日關係發展上具關鍵性的一年。

三、從以上說明可知，東京作為戰後日本華僑社會的中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動的華僑政策產生最密切的關係。相對於此，傳統僑社的神戶華僑社會在戰後的變化所代表的意義與其所提示的課題為何呢？

正如前面所提，東京是戰後華僑社會活動的中心，二二八事件後成立的民促會不僅與中國共產黨和日共聯絡，也在分裂前的東京華僑聯合會佔有重要位置，因此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成立後，在 1953 年的華僑集體歸國與遺骨送還事業中，不僅扮演了北京政府與華僑的聯絡管道，在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中也顯示其背後受北京政府的指導，是具有政治性的機關。<sup>150</sup> 然而儘管如此，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為日本政府承認的「唯一合法」中國政府，因此除了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外，北京政府在其他地區是否也能順利展開爭取華僑呢？

戰後到 1950 年代末，神戶華僑社會人口數在日本居第二位，是在戰前即已形成的傳統僑社，與東京分屬關東和關西地區的兩處華僑集中重鎮。透過本文的分析，神戶華僑社會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之關心，首在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於 1948 年 12 月創刊的機關誌《華僑文化》中表現出來。而華僑文化經濟協會成立於二二八事件前後，是集合了神戶臺籍華僑組成的文化團體，因此由創刊號《華僑文化》中透露的訊息，可以推測該協會應與東京的臺籍華僑同樣，因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使得其中部分臺籍華僑在「祖國」的認同歸屬上，重新思考在「兩個中國」中做選擇的想法。再者，另一個必須注意的現象是，由該協會在文化啟蒙上傾向社會主義中國，其後在華僑集體歸國與遺骨送還事業方面扮演主導角色來看，說明其領導人物多數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前已述及，在東京開始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為臺灣知識分子，而在神戶則是以從事商業活動為主的臺灣商人，呈現在不同地區不同屬性的臺籍華僑在此時期出現同樣支持北京政府的趨

<sup>150</sup> 中共系東京華僑總會乃受中共黨部「海外工作部」之「對日工作處」、「中共社會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解放革命工作委員會」之「對日工作委員會」等之指導。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摘譯〉中共諜報機關『東京華僑總會』昭和卅一年（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全貌』雜誌登載，〈匪共在日活動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05.21/0024。



向。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明是北京政府重視在日臺籍華僑所呈現的結果嗎？亦或是從臺籍華僑在歷經政權轉變後，在去殖民地化主體性的挫敗，與其後國民黨主導的去殖民地化所出現的反差呢？或許有必要進一步由個別人物的經歷，與華僑社會整體的歷史變遷來嚐試分析其祖國意識型態的轉變。<sup>151</sup>

四、另外，也可以看到在北京政權成立前後，在神戶與東京兩地，支持新中國的華僑網絡已然形成。此即由前面提到東京民促會在成立後，將其影響力擴及到關西地區，以大阪為中心展開新民主協會的活動，促進了青年與華僑對新中國的認識與聯絡系統。因此，約與華僑文化經濟協會同時組成的中華青年會、神戶同學會、同文學校校友會三個主要青年團體受到影響，除中華青年會外，在新中國成立前皆已出現支持中共傾向。而北京政府成立後，在 1953 年開始展開與日本的「人道」交流，開啟了華僑歸國與遺骨送還之路。然而國共對立下，這樣的社會事業受到中華民國政府反對，但對部分華僑而言，這些問題非關政治立場問題，而是戰爭遺留下的產物，因此即便受到反對，但卻反成為華僑自發性的活動。1953 年為這個社會事業活動的高潮，從該年神戶華僑的動員情形來看，在無形中應更加強了華僑與北京政府的關係，進一步有利於北京政府從 1954 年開始，以東京為中心向各地展開橫向聯絡體系的建立。例如本文中提到，在同文學校校舍重建時與中華民國政府產生對立之際，華僑青年聯誼會將 1958 年 8 月舉行的旅日華僑青年聯歡節定於神戶召開，以支援同文學校堅持不受政治介入的自主性主張。<sup>152</sup> 從 1957 年的旅日華僑青年聯誼會第一回全國代表者會議與 1958 年的旅日華僑青年聯歡節皆在神戶舉行，即不難看出神戶華僑青年在支持新中國活動方面的積極性。再者，神戶華僑聯誼會成立後，處理華僑與北京政府間的華僑事務，其功能已與神戶華僑總會相同。如此來看，此時期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在日本是代表「中國正統」政權的存在，因此華僑社會仍以中華民國政府的指導為基準，是以北京政府僅能以華僑聯誼會、華僑青年聯誼會來進行統合華僑的工作。亦即，戰後冷戰體制下，日本華僑社會可為「兩個中國」在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中，爭取海外華僑過程的一個實例。

<sup>151</sup> 關於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少，可參考的為何義麟，〈光復初期臺灣知識份子的日本觀（1945-1949）〉，頁 167-207。

<sup>152</sup> 許瓊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の華僑政策と神戶中華同文学校の再建〉，頁 74-76。

不過，戰後日本華僑社會情況複雜，本文以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僑社會組織來看神戶與東京的華僑社會間的變化及連動關係，仍無法全面解釋華僑社會的變遷問題，以及在日臺灣人的參與及其帶來的影響，和臺籍華僑對北京政府的認同歸屬問題。對於臺籍華僑的認同歸屬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已多次注意到，這裏以 1956 年 5 月的調查報告為例，該報告指出「……在日華僑四萬餘，台籍約三萬，大陸籍僑民十之七八反共，而臺籍僑民則同情共匪者反有十之六七……台籍僑民受日治五十年，未經祖國教育，不明大陸政情，光復後多未回台，即鄉情亦不詳，故易受共匪煽惑。第二因境劣蓋日本戰敗受美管制，因民族自尊心強，人民多數變成反美左傾親匪輕華，故台僑亦受影響。是以台僑之傾共情實可憫，有時或反出於愛國心，蓋受匪宣傳，以為匪能佔大陸必政優於我政府，又在韓抗美能迫使美言和必軍威強大，同是祖國兄弟故尊仰之耳。而我政府專心反攻大計，對海外台僑之特殊教導固未暇及也。」<sup>153</sup> 以上為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臺籍華僑所做的調查分析。從本文的討論來看，這樣的解釋似過於簡單，有避重就輕之嫌，這是否反映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在日華僑的認識與分析不足，尚無法確定，這是今後必須深究的問題。

---

<sup>153</sup> 引文已由作者重新標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檔案館藏，「對在日匪共活動之管見（亞太司收文第 8137 號民國 45 年 5 月 25 日）」，〈匪共在日活動檔案〉，《外交部檔案》，檔號 005.21/0024。

## 引用書目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5.21/0024、061/0004、061/0006、061/0008、061/0009、061/0010、914.2/0059。
- 日本神戸華僑歷史博物館藏，〈石嘉成コレクション〉，檔號：雜誌・神戸 No.4・11-2-4、No.5・11-2-5、No.6・11-2-6、No.7・11-2-7；文書・神戸 No.14・1-7-1、No.23・2-3-1、No.29・2-3-7、No.44・8-0-2、No.48・8-0-2。〈陳德仁コレクション〉，檔號：1-7-1、2-1-10。〈陳德勝コレクション〉，無檔號。
- 《中國公論》，1948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中國留日學生報》（3、4號：《留日學生旬報》、5-16號：《中華留日學生報》、以下：《中國留日學生報》），1947-1954年。
- 《中國通訊》，1947年。
- 《中華日報》，1947年。
- 《神戸經濟新聞》，1949年。
- 《神戸新聞》，1945-1946年。
- 《華僑民報》，1949年。
- アジア政経学会（編）
- 1960 《中国政治經濟綜覽（昭和35年度版）》。東京：一橋書房。
- 大澤武司
- 2003 〈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関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研究》49(3): 54-70。
- 川島真
- 2009 〈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收於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31-51。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不著撰人
- 1949 〈中共貿易を擔う人々：業者・華僑・政黨をめぐって〉，《潮流》4(8): 51。
- 中村義等（編）
- 2010 《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
- 中華会館（編）
- 2000 《落地生根：神戸華僑と神阪中華会館の百年》。東京：研文出版。
- 中国人殉難者名簿共同作成実行委員会（編）
- 1960 《中国人殉難者遺骨送還状況——第一次～第八次：ポツダム宣言受諾と強制連行事件》，中国人強制連行事件に関する報告書：第2篇。東京：中国人殉難者名簿共同作成実行委員会。
- 中国研究所（編）
- 1966 《新中国年鑑（1966年版）》。東京：極東書店。

王紅艷

1998 〈中国人遺骨送還運動と戦後中日関係〉、《一橋論叢》119(2): 87-103。

王雪萍

2009 〈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收於劉傑、川島真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203-23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0 〈中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学生・華僑帰国促進政策：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間交渉過程分析を通じて〉、《中国21》33: 155-178。

内閣統計局（編） 1966 《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第54回：1935年復刻版。東京：東京リプリント出版社。

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

2002 《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

台湾新民報社（編集）

1989 《台湾人名辞典》。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霞山会（編）

1962 《現代中国人名辞典（1962年版）》。東京：外交時報社。

1966 《現代中国人名辞典（1966年版）》。東京：霞山会。

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

1970 《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東京：霞山会。

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編）

1956 《中共分析》。東京：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辞典編纂委員会（編）

1992 《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東京：山川出版社。

本田善彦

2006 《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

田桓（主編）

2002 《戦後中日関係史：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白土悟

2007 〈現代中国初期における留学生帰国政策の考察〉、《九州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16: 39-62。

吉田茂

1963 《世界と日本》。東京：番町書房。

安井三吉

2007 〈神戸華僑と近代日中関係〉、收於鈴木正崇編、《東アジアの近代と日本》。東京：慶応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

安藤彦太郎

1995 《虹の墓標：私の日中関係史》。東京：勁草書房。

何義麟

2003 《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5 〈光復初期臺灣知識份子の日本觀（1945-1949）〉、收於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頁167-20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09 〈戰後在日臺灣人之處境與認同：以蔡朝炳先生的經歷為中心〉，《臺灣風物》60(4): 161-194。
- 2010 〈戰後在日臺灣人之組織與活動〉。98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2010 〈戰後在日台灣人における華僑意識の変容〉，發表於日本華僑華人学会主辦、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の地域研究センター・交錯する「北東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諸相」研究会協辦，「日本の華僑華人社会にみる『台湾』：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一側面」（日本華僑華人学会2010年度第1回研究会の報告）島根県：島根県立大学浜田キャンパス，2010年7月16日。
- 別枝行夫
- 2001 〈戦後日中関係と中国外交官（その1）〉，《北東アジア研究》2: 177-197。
- 吳日煥
- 2006 〈1950年代日中・日台関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筑波法政》40: 153-176。
- 林清芬
- 2006 〈戦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10: 97-128。
- 波多野勝、飯森明子
- 2000 〈李德全訪日をめぐる日中関係〉，《常磐国際紀要》4: 1-18。
- 厚生省援護局（編）
- 1977 《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東京：厚生省。
- 徐法馨
- 2008 〈日本吉田内閣期中國政策的原點：以「等距離外交」為探討對象〉，《國史館學術集刊》18: 165-187。
- 神戸臺灣商工會（編）
- 1943 《會則及會員名》。神戸：神戸臺灣商工會。
- 張啟雄、葉長城
- 2007 〈「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的「名實論」分析：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2-1972）〉，《亞太研究論壇》35: 123-193。
- 張篷舟（主編）
- 2006 《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經濟安定本部總裁官房企画部調査課（編）
- 1947 《在日華僑經濟実態調査報告書：昭和22年度調査総括》，華僑調査資料：第3号。東京：經濟安定本部總裁官房企画部調査課。
- 統計委員会事務局、総理府統計局（編）
- 1949 《日本統計年鑑（第一回）》。東京：日本統計協会、毎日新聞社。
- 許淑真
- 1983 〈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1945-1952）：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收於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頁119-187。東京：巖南堂書店。
- 1987 〈新華僑の生成と日本華僑社会の変容〉，《攝大学術、B、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篇》5: 25-42。

- 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日本からの引揚げについて：台湾出身者を中心に〉，《撰大人文学》3：19-41。
- 1997 〈第二次大戦後在日台湾出身者の国籍取得について〉，《近百年日中関係の史的展開と阪神華僑》，頁 35-45。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B)(1) 研究成果報告：平成 7-8 年度，1997。
- 許瓊丰
- 2009 〈在日華僑の経済秩序の再編：1945 年から 1950 年代までの神戸を中心に〉，《星陵台論集》41(3)：117-150。
- 2009 〈戦後中華民国政府の華僑政策と神戸中華同文学校の再建〉，《華僑華人研究》6：63-80。
- 2009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編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在日台湾人と神戸華僑社会を中心に〉。兵庫：日本兵庫県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 陳來幸
- 2004 〈陳徳仁：日中文化交流の橋渡し〉，收於神戸華僑華人研究会編，《神戸と華僑：この 150 の歩み》，頁 99-118。神戸：神戸新聞総合出版センター。
- 2005 〈二戦後の日本華僑社会と華僑教育：「新華僑」臺灣人發揮的作用〉，收於夏誠華主編，《僑民教育研究論文集》，頁 137-157。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 2007 〈神戸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形成と変容の契機——戦前戦後：制度・帰属意識の視点から〉，《不平等条約体制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外国人の法的地位に関する事例研究》（課題番号：15202014）（平成 15-17 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A)(1) 研究成果報告書，平成 19 年 3 月），頁 65-80。
- 2010 〈神戸の戦後華僑史再構築に向けて：GHQ 資料・プランゲ文庫・陳徳勝コレクション・中央研究院档案馆文書の利用〉，《開港都市研究》5：65-73。
- 2010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再建と構造変化：台湾人の台頭と錯綜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的帰属意識〉，收於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 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頁 189-210。東京：千倉書房。
- 陳來幸（編）
- 2004 《神戸中華同文学校：「校友会報」第一号（1949 年）～1971 年 1 月 25 日号（1971 年）》，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資料 3。神戸：神戸大学国際文化学部。
- 2005 《華僑関係新聞雑誌資料：陳徳勝文書》，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資料 8。神戸：神戸大学国際文化学部。
- 陳炎正（主編）
- 1993 《霧峰郷志》。臺中：霧峰郷公所。
- 陳焜旺（主編）
- 2004 《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埼玉：日本僑報社。
- 堀内義隆
- 2008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26-53。
- 須山卓
- 1955 《華僑社会：勢力と生態》。東京：国際日本協会。

飯森明子

- 2003 〈中国紅十字会代表団の再来日と日中関係〉、《常磐国際紀要》7: 197-212。

黃自進

- 2004 〈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 143-194。

楊国光

- 1999 《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露満堂。

過放（解説）、中村哲夫（編）

- 1948-1954 《華僑文化》（數位版），收於〈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学研究費補助金「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資料。

総理府統計局（編）

- 1951 《日本統計年鑑（第二回）》。東京：日本統計協会、毎日新聞社。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996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行政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衛藤藩吉等（編）

- 1967 《中華民国を繞る国際関係：1949-65》。東京：アジア政経学会。

學校法人神戸華僑幼稚園（編）

- 2001 《學校法人神戸華僑幼稚園五十周年紀念刊》。神戸：學校法人神戸華僑幼稚園。

盧冠羣

- 1956 《日本華僑經濟》。臺北：海外出版社。

籠谷直人

- 2006 〈日中全面戦争後の在日本華僑・印僑ネットワーク〉、收於倉沢愛子等編集、《支配と暴力》、頁 157-188。東京：岩波書店。

## Taiwanese Immigrants and Evolution of Kobe Chinese Societies in Post-War Japan

Chiung-feng Hsu

### ABSTRACT

There were more than 40,000 Chinese in post-war Japan; and about half of them were from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Taiwan was no longer a Japanese colony; and many overseas Taiwanese in Japan joined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y outnumbered those from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Such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mpact but also became its key feature. With the end of 51-yea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the overseas Taiwanese in Japan embraced their new identity as “Chinese”. Nevertheless, thei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was inevitab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ir “Motherland”; in particular, the 228 Incident in Taiwan and the split of power in China after the civil war in 1949. Furthermore, the tension among Taiwa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had much influence the overseas Taiwane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 in Japan. After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government handovers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s, some overseas Taiwanese chos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started for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promoting Chinese socialism. Conflicts arose, resulting in the spli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Kobe had a well-established Chinese Society. In fact, it had the second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the post-war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50s. Kobe and Tokyo were the major Chinatowns in Kanto and Kansai area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ere were only a few Taiwanese in Kobe; but the Taiwanese populatio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World War II, so did their rol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ir support to the P.R.C.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verseas Taiwanese in Kobe who supported the P.R.C.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to study the change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in Kobe, and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okyo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of the P.R.C. government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

**Keywords:** Kobe Chinese Societies in Japan,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Promotion Association in Japan, Kob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